

復辟派的背景及其初期活動(1912~1915)

胡 平 生

一、引言

「復辟」一詞，出自尚書；尚書「咸有一德」篇：「伊尹既復政厥辟」⁽¹⁾，是指太甲無道，伊尹將其放逐於桐宮，三年後太甲悔過，復歸於亳，伊尹於是還政太甲，故後人稱已廢之君得復其位為復辟。本文所謂的復辟，則是指民國成立以後圖使清廢帝溥儀復位的行為而言，參與此項行為的人士，便是所謂的復辟派。而「復辟派」一詞為史學家所採用，似乎始自李劍農氏。不過李氏的復辟派，係專指遜清遺老而言⁽²⁾，在意義上似嫌褊狹。就今存各種資料看來，民國以後，或明或暗在各地從事復辟的人士，除遜清遺老以外，尚有以滿籍王公宗室為中心的「宗社黨」，迭在各省舉事滋擾，態度的積極，尤甚於遺老。少數以康有為為首的舊「保皇會」分子，也陸續返國，致力於匡復清室的工作。而一批仕宦於民國的前清舊官僚，表面上與共和政治妥協，却暗中贊助復辟。依此，復辟派的主要成員，應該是來自上述四種背景不同的羣體，即宗社黨人、遜清遺老、舊保皇會分子及舊官僚羣。本文的目的，便是從這個觀點來探討復辟派的內部結構和初期活動，至於有關復辟派日後的發展經緯，則因牽涉太廣，離題過遠，只在結論中稍加提及而已。

二、宗社黨人

(一) 宗社黨的緣起

宗社黨成立的確切日期，已不可考。然據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一月三日上海的民立報載稱：

良弼與鐵良、蔭昌等密謀組織宗社黨，行文內外城，巡警總廳派秘密偵探逮捕民黨，豫備與漢人為最後之決戰⁽³⁾。

一月五日民立報又載稱：

載洵、良弼等組織宗社黨後，屢次密議，居近外務部之各國人，懼其生亂，紛紛他徙⁽⁴⁾。

(1) 尚書（孔傳；四部叢刊初編經部，臺北、商務，民五十四年），卷四，咸有一德第八。

(2) 李劍農：中國近百年政治史（臺北，商務，民五十一年），頁432。

(3) 民立報（臺北，中央黨史會影印本），民國元年一月三日，頁2，北京電報。

(4) 民立報，元年一月五日，頁2，北京電報。

按此，宗社黨當成立於一月三日至五日之間。但近代史專家郭廷以却謂成立於一月十二日⁽⁵⁾，李劍農則謂成立於一月十九日⁽⁶⁾。郭、李二氏夙負時譽，卓著成就，所說自必有所本，可惜皆未註明資料來源，遽難令人所信。至於其他書報關於宗社黨的記述，不僅未能指出其成立的確切日期，在內容方面也多半過於簡略、含混，甚至道聽途說，輾轉抄襲，完全失去參考價值。

民國元年一月十七日起，清廷鑒於局勢危迫亡不旋踵，而召開一連串的御前會議⁽⁷⁾。出席的滿蒙王公世爵，對於清朝存廢的態度，分為強硬和軟弱兩派。反對退位的強硬派有恭親王溥偉、肅親王善耆、禮親王世鐸、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、貝勒載瀛、載洵、鎮國公載澤等人。其後隆裕太后決意媾和，並發表清帝退位的懿旨，於是溥偉拂袖離會，變賣家產作為宗社黨的經費，善耆則意氣昂然，擬亡走東北，別樹一幟；載澤也暗中與宗室鐵良呼應，力圖恢復滿清宗社⁽⁸⁾。一時滿人種族情緒高漲，侍郎桂春且有殺盡北京所有漢人的建議⁽⁹⁾，雖未被接納，却使北京城內氣氛大為緊張。溥偉、善耆、載澤等宗社黨人，進而指責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出賣清廷，企圖剝奪袁氏的軍政大權，然後統兵南下，與革命軍作最後的決戰。宗社黨人的強硬態度，遂構成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的最大阻礙。其中尤以良弼(字寶臣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一八七七～一九一二)，是「宗社黨之主動，而其機智又足以濟之者」⁽¹⁰⁾。早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返國後歷任副都統、協統、陸軍部尚書、軍諮使等職，「平日以知兵名，頗自負」⁽¹¹⁾，對清廷預備遜政，素持堅決反對的態度⁽¹²⁾，深為革命黨人所忌視。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，革命黨人彭家珍擲彈炸傷良弼，數日後良弼傷重殞命。宗社黨遭此打擊，人人自危，不敢再堅持前議，清廷乃於二月十二日正式頒布退位詔書，結束了為時兩百八十六年的統治。清帝退位後，宗社黨領袖溥偉、善耆先後奔赴旅順、青島等地，倚日、德保護，號召滿、蒙人士，致力於匡復清室的活動。善耆且與日本大陸政策論者川島浪速勾結，進行所謂「滿蒙獨立運動」，民國十一年(一九二二)，善耆客死旅順，在臨終前猶念念不忘故君，

(5) 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國史綱》(臺北，南天，民六十九年)，421頁。郭廷以編：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，第一冊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六十八年)，頁7。

(6) 李劍農：《中國近百年政治史》，頁338。

(7) 張國淦：《辛亥革命史料》(香港，龍門)，頁310。

(8) 山崎誠軒：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上)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(東京，一九一三年六月)，頁14～15。

(9) 岑學呂編：《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》(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)，頁110。

(10) 吳慶坻：《辛亥殉難記》(臺北，大通，民五十八年)，卷三，頁2。

(11) 谷鍾秀：《中華民國開國史》(臺北，文星，民五十一年)，頁69。

(12) 尚秉和：《辛壬春秋》(同上書)，卷四十五，頁12。

以未能完成復辟爲生平最大憾事，耿耿忠悃，於此可見⁽¹³⁾。善耆既歿，溥偉也無復當年氣象了。

從上述宗社黨的緣起看來，宗社黨只是由極少數滿清王公宗室如載洵、良弼、溥偉、善耆、載濤、載澤、鐵良、毓朗等人所組織的一個小團體而已，旨在維護滿清的宗廟社稷，雖名爲黨，似並無具體組織。良弼被炸，它已名存實亡。清帝退位後，由於溥偉、善耆、鐵良、升允等奔走呼號，各地滿、蒙人士基於公憤私仇，或乘勢響應，或到處滋擾，以抗民國。當時的報刊雜誌多稱他們爲宗社黨，宗社黨的定義，遂由當初一個寥寥數十人的私人小團體，擴大爲包括所有滿蒙復辟勢力在內的地方性大集團，因此，後者的活動，也較受矚目。

民國元年、二年是宗社黨人活動最頻繁的時期，據日人的調查，宗社黨人的活動範圍遍及奉天、吉林、湖北、直隸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甘肅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等省⁽¹⁴⁾。宗社黨所以能紛擾十餘省，約有以下幾個要因：其一、清初以來，滿洲八旗分駐全國各地，已成定制，民國以後，各地旗營陷於孤立，深懼漢人趁機報復，往往容易鋌而走險，屢興事端。其二、是民國初肇，政局不穩，經濟凋敝，盜賊蜂起，宗社黨乃因勢利導，勾煽各地匪人爲亂。其三、民國初年，列強在中國各地領有租界甚多，宗社黨即利用這些租界作掩護，嘯聚黨衆，貯藏軍火，四出滋擾；故租界愈多的省分，往往就是宗社黨最活躍的地區。其四、一些地方上的惡勢力，如盜匪、幫會、莠民等，多假借宗社黨名義，以壯聲勢，從事劫掠，世人不察，都視之爲宗社黨行動。

從今存有限的資料看來，宗社黨人活動的方式，不外武裝起兵、暗殺政要、宣傳復辟、聯絡同志而已。至於宗社黨的領導階層則多爲滿蒙王公宗室，以及卸職的前清文武官員，武力基礎則多半來自盜賊、幫會（指秘密會社）、無業遊民、失意軍人（尤其是各省駐防旗兵、新軍兵弁），所以，一些著名匪首、地方豪強、及幫會主腦，也往往躋身於宗社黨領導階層。由於缺乏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的聯繫，宗社黨人雖迭在各地舉事，終不免失敗的命運；加以黨衆分子駁雜，素質低落，上海的申報曾載宗社黨人胸前均刺有二

(13) 善耆臨終前，曾上奏摺，由其友人爽良代筆，全文如下：「奏爲竇恨哀鳴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：竊臣幸託宗枝，長靄門廕，拜爵之始，遭值拳禍，廬宇盡燬。荷蒙先朝哀憐，昇司崇文樞務，臣梳剔積弊，課入驟增。狼因見知，管理步軍統領、充御前大臣，補民政部尚書，調理藩部尚書。辛亥兵變，各處響應，卒以召用非人，潛移國祚，疾首痛心，莫此爲甚。臣力爭不聽，挽救無術，更不能與盈廷泄沓，遁之旅順，偷延視息，潛抱艱貞之志，恨無開濟之才，每伺再造之機，終乏一成之寄。瞻望觚棱，瞬逾十稔，憔悴就死，臣罪當誅，伏願我皇上蓄德養晦，祈天永命，重光郅治，比隆康武，微臣雖在泉壤，蒙袂含欣。臣有子十餘人，率皆駑下，不堪負荷，況臣久誤親賀，罪過實深，敢請納還爵土，即日停襲，少贖臣愆，以畢臣志，伏枕鳴咽，不知所云。」詞甚悽楚激昂，足見其意志一斑。文載爽良：《野棠軒文集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七年），卷三，頁15。

(14) 山崎誠軒：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、（下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、十三號（東京，一九一三年六～七月）。

龍形，而手肘用滿洲文字刺寫本人姓名，以爲標記⁽¹⁵⁾，足見黨人的愚昧無識，自然是難以成事。不過，宗社黨人屢挫屢起，每每把握民國政局的紛亂時機大舉活動，因而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二次革命期間，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討袁護國期間，宗社黨人的活動都曾掀起高潮，至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以後才日漸消沉，趨於沒落。

（二）宗社黨初期活動的地理分布

1. 東三省

東三省係滿清發祥地，幅員遼濶，民風强悍，因此清帝退位後，該地宗社黨人迭起紛擾，最爲活躍。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三日，袁世凱總統接獲密報，略謂近有俄人在大連、鐵嶺等處代宗社黨運輸軍火。袁即電奉天都督嚴爲查拿，並諭外交部與駐京俄使交涉⁽¹⁶⁾。

同年六月二十九日，上海的時報載稱，民軍在遼源州搜獲大批軍火，係由宗社黨私運至奉天者。雙方曾發生衝突，各死數人，傷十餘人。結果宗社黨人不支，紛棄軍火而逸⁽¹⁷⁾。八月四日，有前清統領李洪亮者，在錦州城募集城內旗人及土匪約九十餘名，向奉天進發。錦州知州在呈報奉天都督時指出，李洪亮係受肅親王所托，於北京籌集軍費，收買錦州當地馬賊，至康平縣加入宗社黨，以壯其聲勢⁽¹⁸⁾。

八月十五日，前清鎮國將軍溥麟及振恩二人，奉青島宗社黨本部密旨，經奉天省洮南府，以滿、蒙、俄三種文字，向內蒙古王公散發興復清朝聯合滿蒙，顛覆共和政府的檄文，各蒙古王公贊成者不少。爲此，當地風聲鶴唳，人心大動，洮南府知府急向奉天都督報告⁽¹⁹⁾。

八月十七日，時報載稱，距長春五十里處，緝獲大宗軍火並宗社黨一名。嚴訊之下，知該黨人頗與日本商人有密切關係⁽²⁰⁾。八月二十日，庫倫陸軍大臣陶什陶在洮南府及內蒙一帶傳送檄文，號召滿、蒙人等迅速歸順，協助外蒙獨立團體⁽²¹⁾。八月二十五日，奉天省城先鋒營軍隊加入宗社黨，圖謀起事，爲該營統領吳子琴偵知，迅將該營兵等拿獲，捆解防營辦公處提訊。當將首謀者王金聲槍決，餘黨分別革職懲辦⁽²²⁾。

(15) 申報，五年九月四日。

(16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二十五日，北京電報。

(17) 時報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。

(18) 山崎誠軒：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8。

(19) 同上，頁19。

(20) 時報，元年八月十七日。

(21) 同註(18)，頁19。

(22) 參見同上。民立報，元年九月七日，頁7。

九月五日，奉天俠客李化南加盟當地宗社黨，擔任助蒙隊第五營統領，經洮南府入內蒙古，擬投效烏泰之軍。事洩，李與二十四名部下悉被逮捕，即予斬決⁽²³⁾。九月十日，奉天省城雍和山房紙店店主雍子明，受宗社黨吳錫麟等人所託，代為製印軍用手票約兩萬張，每張自一角至五十元不等，合計五十萬元，並有委任書札等件。為奉天警務局探訪隊發覺，即將雍某拿獲懲治⁽²⁴⁾。九月十六日，奉天當局在省城小北關拿獲宗社黨首領前清協領興某等四人，並搜獲信札多件。翌日又捕得三名宗社黨人，其中一名且係該黨副司令⁽²⁵⁾。九月三十日，民立報載稱，奉天都督趙爾巽最近拿獲宗社黨數十人，携有肅親王委任狀，及起事軍用票多張。前日袁世凱密令王賡至奉，即為查辦此事⁽²⁶⁾。同時安東縣知事呈報，安東防營亦拿獲宗社黨沙某等三人，並搜出手槍兩枝，炸彈二十枚。海龍府方面則捕獲宗社黨董某一人；董某曾於就逮時拒捕，擲彈炸傷管帶王紹庭⁽²⁷⁾。

十月八日，時報及民立報均載稱，宗社黨多潛伏於南滿鐵路沿線用地之內，依恃某國人士庇護。奉天公署據偵探報告，謂省垣車站運來木箱多件，卸車時有形似某國兵護衛。經秘密訪查，則槍枝以外，聞係大宗炸彈，現藏鐵路附屬地某國人名宗華園家，確係接濟宗社黨之用，昨日又探有河崎武等三、四人代宗社黨運炸彈事。奉天都督趙爾巽鑒於近日宗社黨在南滿鐵路沿線愈聚愈多，恐一發不可收拾，現已派員分段密查詳情，以憑交涉。聞昨日委姜玉琦赴大連調查該黨總機關部及其重要首領姓名。又派蘇封赴開原一帶訪查該黨人數，以及某國人士對於該黨的舉動⁽²⁸⁾。

十月十五日，時報載稱，奉天所獲宗社黨八十二人，其中三十六人均已訊實謀叛而槍決，餘皆監禁，懲罰有差⁽²⁹⁾。十月二十一日，民立報又載稱，長春頭道溝暗藏有宗社黨人胡魁麟，僭稱三省都督。又有當地土匪李寶亭，假黨人名目，自稱分統，聯合黨首德林、王廷、馬海山、徐漢武、李洪亮等，晝夜圖謀，甚形詭密。因近日防堵甚嚴，又有查拿舉動，該黨現已潛往他處⁽³⁰⁾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安東巡防營受宗社黨于新、魏財（一作魏才）等人勾煽發生兵變。首將哨官王少林綁縛，隨將全隊拉出，直奔官銀號，肆行搶掠，計得洋票三萬六千餘

(23) 山崎誠軒：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9。

(24) 同上。民立報，元年十月五日，頁7。

(25) 民立報，元年十月五日，頁7。

(26) 見同日之民立報，北京電報。十月二日時報亦載，奉天大索宗社黨匪，開已捕獲重要人員數十人。

(27) 民立報，元年十月五日，頁7。又據元年十月三日民立報載稱，海龍府所捕獲宗社黨董某為董相臣；董因拒捕，將吳管帶炸斃。

(28) 均見同日之時報及民立報，惟其中提及的河崎武，係日人川崎，中國名字為何其武；見黃遠庸：《遠生遺著》（臺北，文星，民五十一年），卷一，頁292。

(29) 見同日時報。

(30) 民立報，元年十月二十一日，長春通信。

元，次搶大清銀行，得洋六千餘元，又至當舖、米店、錢莊等處掠奪，即向紅石砬子方面逃亡。巡防營管帶宋玉軒接報，急電鳳凰城巡防營統領馬騰溪（一作馬龍潭），馬立飭第五營管帶陳錫九率全營會同追捕變兵。然僅拿獲于新、魏財、李言吉、李發四人，於二十一日一併梟首示衆⁽³¹⁾。十一月二十日，吉林巡防營統領鄭寶齋在伊通州猝爲宗社黨人刺殺。陸軍第二十三師師長孟恩遠接訊，即傳飭部下探拿凶犯，並派兵在吉林省城日夜巡查，嚴防宗社黨破壞滋事⁽³²⁾。

十二月一日，奉天高等偵探長王子興向都督張錫鑾呈文報告，謂東三省宗社黨係分布於南北滿鐵路沿線及大連、旅順、奉天、遼陽、復州、安東、鐵嶺、長春、吉林、伊通州、四平街等要地。鐵路沿線的宗社黨又可分爲三路，南路以周翼之爲首，北路以左憲章爲首，中路以朱少臣爲首；三路聲息相通，而聽南路號令⁽³³⁾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宗社黨人張瑞亭至吉長鐵路事務局勸誘局員入黨，吉長車站車長宋惟安假意允諾，旋向巡警局通報，巡警局急派員將張逮捕。據張供稱，宗社黨機關本部設於青島，現該黨首領魏天時、王化成，奉機關本部委任來奉天運動軍界。旅順機關部則由顏白毛、張潤之負責，潛伏於寬城子方面。巡警局隨將張押赴奉天都督府，當行刑時，張並無懼色，猶連呼「大清萬歲，吾皇萬歲」等語⁽³⁴⁾。

民國二年年初，由於奉天、吉林一帶緝捕甚嚴，一時多數黨人潛往青島暫避。同年二月遜清隆裕太后病逝後，黨人又圖活動，在奉天被捕多人，並搜得旗幟甚多，上有「天兵保清」字樣。而復州地近大連灣，黨人尤多出沒⁽³⁵⁾。二月十九日，復州知事申鍾嶽呈報奉天都督，略謂復州近有宗社黨潛謀不軌，希圖煽惑，藉以乘機搶掠，復州州署警兵額少，分配不足，州城僅有警兵四十餘人，聞防營有開拔的信訊，商民益形恐惶，仍懇都督速飭新簡駐復防軍趕日來復，以資鎮懾⁽³⁶⁾。翌日，申鍾嶽又呈報奉天都督，略謂據復州議會議長張悅令面稱，大連宗社黨思擾莊河、復州各節，探係實有此事，並非謠傳。據駐防奎連長報告，該黨實聚有千餘人，加以土匪乘機，強鄰助膽，遂致毫無忌憚。又據前派密探報告，顏九官（號白毛）實寓於大連浪速町中華客棧，併由日商訂買軍械子彈，由華商訂做軍衣。其餘首領有邵子風（或作邵子峰）、張夢九、鮑化南等，皆聽肅親王指揮。其機關有二：一在旅順太陽溝前都督府左近；一在大連西沙河口，均

(31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9~20。民立報，元年十二月二日，頁8。民立報，元年十二月三日，頁7。

(32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下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2。民立報，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頁18，吉林通信。

(33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20。民立報，二年一月二十日，頁7。

(34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下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2~13，民立報，二年二月十六日，頁8，奉天通信。惟民立報謂張瑞亭就逮於舊曆臘月杪（即民國二年二月上旬），今據「支那之宗社黨」所記。

(35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5。

(36) 時報，二年三月二日，宗社黨蠢動近報。民立報，二年三月二日，關東宗社黨蠢動。

有日本人保護。聞該黨擬俟奉軍協征外蒙，即乘機佔據莊河、復州，而長春、公主嶺、五站一帶亦同時響應。統計各處黨羽(加上潛伏於安東者)，約三千四百餘人，均有名冊可稽。風聲所及，莊、復遂日覺惶恐，而復州尤甚，望軍隊速來，庶可防患於未然⁽³⁷⁾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宗社黨青島機關部派遣豐閣臣等十餘人，前往哈爾濱、齊齊哈爾等處，散布流言，希圖起事，有不少人爲彼等煽惑，加入該黨。據云彼等所散布的流言，約有下列數項：(一)宗社黨約定擁庫倫活佛獨立，以恢復清朝。(二)俟庫倫軍南下到來，即翻反旗以抗民國政府。(三)已舉勝福爲宗社黨北部領袖，不久即當佔據黑龍江省爲根據地。(四)現在北滿宗社黨均與呼倫貝爾總監勝福暗通消息。(五)宗社黨在黑龍江起事時，俄國嚴守局外中立⁽³⁸⁾。

四月七日，奉天都督張錫鑾收買宗社黨首領馬丐俠(爲著名馬賊)，聘爲都督府高等顧問，負責解散該黨以自效⁽³⁹⁾。四月九日，長春府顏道溝日本車站潛伏有宗社黨魁宋錦堂、侯萬福、左憲章、李春元等三十餘人，均恃日人爲護符，與各機關部秘密通訊，日前曾電調大連該黨部長榮陞等四人攜帶手槍抵長春磋商暴動方法。不料事機洩漏，被駐長春混成旅旅長裴其勳聞悉，即欲派兵往捕，亦爲該黨覺察，宋、左二人遂附路潛逃至哈爾濱，住租界八道街某俄人處，餘皆四散，聞逃往大連者最多⁽⁴⁰⁾。四月二十日，東路觀察使朱之芾電報奉天都督張錫鑾，謂現有宗社黨人連敬、萬成東、朱奎等在鴨綠江西岸一帶出沒，力謀擴張黨勢，手段極爲巧妙，黨人日益附從，必須嚴加取締，並組織巡兵監視隊，時常尾隨偵伺，以防該黨圖謀不軌⁽⁴¹⁾。

至同年夏天，東三省一帶邪教蔓延，名目衆多，其中以黃天教聲勢最盛。該教自共和局定，即結聯宗社黨共圖舉事。待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南北構戰，該教遂趁機派遣徒衆，分投各處，布散謠言，謂此次南北之戰正天假之緣，大清可藉以恢復。並謂剪髮者將有所不利，一般無知之徒，爲所煽惑，多思留髮，人情殊爲洶洶⁽⁴²⁾。據悉該教巢窟是設在吉林省雙陽縣靈巖閣，凡榆樹、賓縣、新城、長春等屬入教者日多。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，雙陽縣知事茹澤涵親率軍隊暨通城警察前往靈巖閣查捕。結果在該教秘室中搜獲六楞印章兩顆，入教名冊三本；據名冊所載，即雙陽縣當地大小糧戶入教者已有四千餘名，該閣首領即冊中第一名蔡老爺。並搜得槍彈及各違禁物品。聞該教首領蔡某，

(37) 時報，二年三月二日，宗社黨蠢動近報。民立報，二年三月二日，關東宗社黨蠢動。

(38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3。民立報，二年四月一日，頁6。

(39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上)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21。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八日，北京電報。

(40) 民立報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，頁8，哈爾濱通信。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3。

(41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上)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21。

(42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六日，頁8，哈爾濱通信。

日前並在北京、大連等處確有勾合宗社黨情事(43)。另外，黑龍江省海倫縣議員李德明，也係黃天教一派。近在海倫招致教衆多人，自稱彌勒雲霞主，道號天禪。手下有五大元勳（五大王爺）崔德禮、張姓、鄭姓、曹姓，及劉珠五人。聞崔德禮掌財政，刻下又復抵北京，聯絡宗社黨，擬定本年八月中秋在海倫各屬興兵舉事(44)。

其他尚有大宗教，原名如意門，純以反抗共和保護髮辮爲主義。近聞東三省入該教者，已超過五萬餘人，每人一年納捐三十六元。教徒劃分等級，有兵丁、秀才、狀元、知縣，及封侯拜相等名稱。其首領有王春風，綽號王餡兒餅，官銜爲督辦大臣；其次爲吏部尚書李紹先、吏部侍郎喬雲福、侯爵李小辦、海軍大臣王竹山、外交大臣張連山等人。該等首領多匿居哈爾濱租界內，並製有黃袍、龍衣及前清種種官服如黃馬褂等類；曾與宗社黨首領升允晤商，約期起事。又該教聞張勳盤踞山東，志在恢復清朝，即於二年七月中旬派其吏部尚書李紹先携帶教徒附路西下，俾期與張勳面商機密，並將籌集之款帶具若干，以助張勳餉需(45)。

又有楊梅教；據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民立報「哈爾濱通信」載稱，濱江縣署昨奉吉林都督急命，謂奉國務院江電，內開有楊梅教匪左一峯、韓宮等四人，受宗社黨首領前清恭親王委派到奉天省城，寓西門外皇覺寺，會商機密。並擬派人至東三省、蒙古交界地方招募鬍匪（馬賊）兩萬人，均自帶槍馬，餉需優厚，由宗社黨重要人物分擔，共七十萬元，冀與庫倫方面聯合以圖大舉。各省務須協力嚴緝，俾遏亂萌(46)。

至民國二年八月，宗社黨在東三省益形活躍，傳聞宗社黨首領升允、鐵良、溥偉等均曾潛赴奉天、吉林一帶運動。八月十一日，民立報駐奉天記者電稱，有宗社黨在復州、莊河一帶廣佈機關，圖謀暴動，已與山東、仁川各總機關議定，擬乘機攻佔北京(47)。八月十三日電稱，宗社黨又在安東起事，奉天都督張錫鑾派鴨綠江炮艇馳往防勦(48)。八月十六日又電稱，宗社黨首領孫某，竄往莊河、大孤山一帶，糾集黨羽，以圖再舉，張錫鑾已派員往探，相機勦辦(49)。八月十七日電稱，宗社黨託各滿蒙偵視團在各旗煽惑，反對共和，已由張錫鑾電飭駐蒙邊各軍隊一體嚴拿究辦(50)。八月二十五日電稱，宗社黨張玉山、吳文英、何賡泉，由大連運軍衣軍械多件至奉天，均寓居日本

(43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，頁8，吉林通信。

(44) 民立報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頁8，哈爾濱通信。

(45) 同上。民立報，二年五月十三日，哈爾濱通信。民立報，二年九月三日，吉林通信。

(46) 同註(44)。

(47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十三日，奉天特電。

(48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十五日，奉天特電。

(49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十八日，頁3，奉天特電。

(50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十九日，頁3，奉天特電。

車站附屬地福順店內，勾結匪人，圖謀不軌，張錫鑾都督已指令各營隊一體查拿⁽⁵¹⁾。八月二十九日電稱，遼陽男巫張神仙串通宗社黨，圖謀不軌，已由都督府派員捕獲來省⁽⁵²⁾。八月三十日又電稱，駐奉陸軍第二十七師連日擒獲宗社黨多名，分別拘禁槍決⁽⁵³⁾。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，北滿各報喧傳宗社黨首領鐵良派出黨羽三十餘名，均持有大連總機關部委任狀，並攜帶黨冊，分布吉林、黑龍江兩省，秘密運動大股馬賊及黃天教徒。擬首先發難，其長春、大連各機關都同時響應，佔據東三省為根據地，以海拉爾蒙人為後援。現已由哈爾濱某國洋行購妥軍火若干，鐵良不日赴哈，秘密布置等等。實則黨人故作無稽之謠，以淆惑人心而已⁽⁵⁴⁾。

2. 湖 北 省

湖北是辛亥革命首義地區，安危攸關大局，影響視聽，故該省宗社黨人活動也十分頻繁。加以湖北境內駐防旗丁甚衆，武昌起義之初，湖北革命黨虐殺滿人甚慘⁽⁵⁵⁾，滿人為了報復和自保，多加入宗社黨，在湖北各地迭生事端。尤其是武漢一帶，扼長江上游，軍隊密布，宗社黨人活動即係從聯絡軍隊着手，不惜巨金，希圖孤注一擲，以牽動大局，恢復清朝。

據湖北都督府偵探隊報告，宗社黨係以漢口租界為根據地，奉前湖廣總督瑞澂為首領。由瑞澂擔當南京、蘇州兩方面；前湖北軍事參議官鐵忠督率武昌、漢口兩方面，朗札負責長沙、漢口間的連絡。另有軍需購求處，由前湖北兵備處員金坤山、前湖北通判繼忠、前湖北禮督司王元仲、前襄河水師管帶程德洪等人支配。其經費來源是鐵忠自湖北督練公所取出的八萬兩銀，及陸軍大臣蔭昌所贈五十萬兩。而當地的宗社黨時分兩派，一為皇武隊，以在職或卸職的前滿漢武官為主；一為俠士隊，則由誠心歸附或被收買的地方豪俠及土匪頭目等組成⁽⁵⁶⁾。

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七日，駐漢口湖北陸軍第二鎮統制張廷輔被刺身亡，其後查明係

(51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，頁3，奉天特電。

(52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三十日，奉天特電。

(53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，奉天特電。

(54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7。

(55) 據金城氏：湘漢百事，「誅戮滿人」條記武昌起義後革命黨虐殺滿人情情形云：「武昌於（八月）十九以後，數日間殺滿人凡數百，寶瑛、鐵忠、札鳳池、卜玉等公館，均被抄沒。軍士見滿人，皆目睜眉豎，無一得活者。寶瑛有女就戮時哭曰：『我等固無罪，但恨先人虐待君耳。』又一老嫗曰：『諸君殺我輩何益，我輩固無能為也；何如留我輩以示寬宏？』然軍士皆不聽，卒殺之，見者慘然！」文載陸保藩輯：滿清稗史（臺北，文海影印本），卷上，頁7。

(56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上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7。

宗社黨王童剛、劉子英等人所爲⁽⁵⁷⁾。四月十九日，武昌方面拿獲宗社黨人胡天鵬及湯佐恒。胡爲解職軍官，前充鄂軍某營管帶，湯爲某營現職隊官。二人因替宗社黨散發票布，並常在某營演說，肆行鼓惑，爲密查員偵悉，呈報副總統黎元洪（兼湖北都督），遂將二人誘捕，訊明處決⁽⁵⁸⁾。四月二十一日，陸軍第二鎮第二協第八標第一營管帶王童剛，爲宗社黨重金收買，謀刺該鎮統制王華國，爲第七標司務長某看出破綻，立將王童剛逮捕處決。旋又在第八標拿獲其同黨劉子英（係第一營隊官）等六人，一併解送至篤安里鎮司令部。正提訊時，劉突取槍射擊王統制未中，被護兵掩住。是夜，經黎元洪核准，即將劉處決，其餘五人准於二十二日解交武昌軍法司訊辦⁽⁵⁹⁾。

五月中旬，漢口發現宗社黨徽章⁽⁶⁰⁾。五月十七日，宗社黨荊州支部首領前清荊州將軍連奎之子，化名傅鳳池，潛伏於漢口租界，密謀顛覆武昌都督府。爲偵探隊偵悉，將傅誘至法租界春蕃菜館加以逮捕，並在傅居所起出手槍七十支、子彈三萬發。隨將傅交附軍法會議嚴訊，結果發現與傅有牽涉的尚有都督府軍務部軍需官一名，及衛兵司令所傳令使一名、步兵二十名。爲此，黎元洪特頒戒嚴令，並飭水師統領何錫藩令水上各處嚴加取締。同日夜半，遂將傅鳳池等二十餘人槍決於武昌兩湖書院門前⁽⁶¹⁾。

其時又有袁正海等二人，僞稱傳送袁世凱總統的密旨，要求面謁黎元洪，旋被衛兵查獲其身上藏有武器，立予逮捕，交附軍法司嚴審。據袁正海供稱，係奉漢口宗社黨命令，旨在暗殺革命先舉者黎元洪。當日即將袁等二人槍決⁽⁶²⁾。另據民立報駐武昌特派員五月十六日電稱，漢陽拿獲宗社黨七人，武昌拿獲宗社黨十一人，已訊明正法⁽⁶³⁾。五月十七日電稱，武昌謠傳有大股宗社黨來鄂，潛圖煽亂，首領鐵忠、寶瑛已到漢口租界，風聲甚緊。日昨先後拿獲該黨二名，其一供稱上海尚有百餘人；其一身畔搜出函件，內容秘密，無從探悉⁽⁶⁴⁾。五月十九日又電稱，謠傳有大股宗社黨來鄂煽亂，且聞與抵制裁兵減餉的湖海會密謀聯合，現武昌戒備極嚴，小輪停渡，城門戒嚴，附郭江岸亦添置重兵⁽⁶⁵⁾。

五月二十日，時報載稱，滿人亮方在荊州城內其家宅後地板下私藏子藥炸彈五十

(57) 時報，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及四月二十八日。

(58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武昌通信。

(59) 同註(57)及(58)。

(60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14。

(61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上)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6~17。惟所記傅鳳池就逮日期爲四月十日，恐誤；茲據民立報（元年五月二十三日）所載，當爲五月十七日。

(62) 同註(56)。

(63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七日，武昌電報。

(64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八日，武昌電報。

(65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二十日，武昌電報。

餘箱，手砲快槍二百餘支，與北京新到荆州的宗社黨聯成一氣，每逢黑夜，即將此批槍械彈藥用繩捆繫，自城上墜下，由宗社黨人在城外接運至康熙廟埋藏，俟北京宗社黨到齊，再行約期起事。不意日前陸軍第七鎮巡察隊查夜至該處，見情跡可疑，遂將現場諸人帶回，由該鎮統制唐儀支嚴行拷問。其中額克登受刑不住，吐露實情，唐統制即派兵兩隊至亮方家搜索槍彈，並將亮方拏獲，復派馬隊一營將康熙廟圍住，所有埋藏槍彈，盡行搜出，隨將亮方以下五十二名宗社黨人悉行斬首示衆(66)。

五月二十八日黎明，有宗社黨人二十餘名，運大皮箱九十餘只，在漢口大智門搭車北上。火車站稽查軍隊見形跡可疑，正詰問間，突有一人身畔墜下銀質勳章一面，上書宗社黨字樣，當將諸人一併拿獲，送省訊辦。外間傳言各箱面上係尋常男女衣服，其下則係黃色軍服與龍旗之類，大約係因在鄂不能起事，擬移往北方活動。又有謂各箱係鐵忠、寶瑛等從前置放漢口者，並無違禁物品(67)。

六月三日，民立報駐武昌特派員電稱，有大冶人向海潛在黃石港組織富國公司，招集江湖黨，發給徽章，約期起事，與宗社黨有密切關係，黎元洪特派員將該公司幹事倪國等三人先後拿獲正法，搜獲快槍七十支，向海潛聞風逃往上海(68)。六月五日，時報載稱，有漢口蘆荊街某商機器廠經紀高津亭，與其炮竹店主袁炳山私造炸彈，於前日經都督府偵探員張炳揚查知，報請該段巡警協同拿獲，解廳管押。昨黎元洪以該行東某國人文克利出面交涉，謂警察不應擅拘其用人，遂又派偵探科員丁寅祥、周漢芝會同張炳揚查訪其實證，旋據該員等回報稱：該機器廠機匠周春山報告，該廠私運彈藥，裝入芝蔴袋內，外套木箱。第一次由火車載往北方十六箱，第二次載往三十箱，此次有十一箱；運走甫二日，尚有數十箱未運，不知藏匿何處。聞高、袁二人均係宗社黨，某國人亦與有密切關係。現黎元洪已飭外交司與某領事交涉(69)。同時有第二鎮軍械官彭玉山為宗社黨所利誘，暗與互通聲息，約定該黨起事即盡以所管軍械資助，終以為探員搜獲密函，敗露被執(70)。

六月七日，民立報駐武昌特派員電稱，有畢陵居民陳國瑞等報告，荊州旗人有與宗社黨陰謀煽亂形跡，湖北都督府軍務司當飭軍事局派員往查，並飭駐荊州第七鎮嚴密防範(71)。六月二十八日又電稱，外間謠傳保清會來鄂煽亂，黎元洪副總統已飭各鎮協嚴

(66) 時報，元年五月二十日。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上)，支那，四卷十二號，頁17。

(67) 時報，元年六月五日。

(68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四日，武昌電報。

(69) 同註(67)。

(70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18。

(71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九日，武昌電報。

密查拿防範⁽⁷²⁾。聞保清會係由寶瑛等宗社黨人所組織，在漢口某租界設有總機關部，各退伍兵士及被裁撤人員多入該會⁽⁷³⁾。其真實情形，已無法確知。

3. 直隸省

民國元年二、三月間，宗社黨首領玉均糾集黨人，在北京東四牌樓炒麵胡同雙宅開秘密會議，勗勉黨人力圖恢復，不可自餒其志。並謂曾致電梁啟超，請其在日本速聘一陸軍退任軍士，以備顧問。梁已來覆電，云現聘得一新近退任的小村次郎，刻於陽曆二月二十四日乘輪抵滬，想五、六日可到北京。另外，宗社黨又遣人往說駐永平府通永鎮總兵王懷慶，許以開國功勳，促其舉事⁽⁷⁴⁾。上項報導，竟謂梁啟超與宗社黨有往來，真令人非夷所思，想係宗社黨人自我吹噓而已。

三月十三日，民立報載稱，天津地面仍有宗社黨出沒，其往來電報均用密碼，且多替代字，如監督新政府、法制、法律等名詞，語句多不可解⁽⁷⁵⁾。三月二十三日載稱，昨日北京發現炸彈百餘枚，查係宗社黨所有⁽⁷⁶⁾。四月九日又載稱，北京前忽謠言四布，謂宗社黨不日舉事，以致人心動搖，現已告無事。又謂近有宗社黨人舒崇阿（禁衛軍帶隊官），終日在藍甸廠附近運動禁衛各軍，欲謀不軌。又有宗社黨人文某（禁衛軍幫帶官），朝夕在禁衛軍中煽惑，軍人每月捐洋一元，現已捐得一千八百餘元。此項洋元係作為購置炸彈之用，專為對付袁世凱總統⁽⁷⁷⁾。

四月二十日，天津鐵血監督團首領曾廣為，受宗社黨運動，欲謀害袁世凱總統，經人告發，即被逮捕⁽⁷⁸⁾。據稱曾廣為去年十月間在天津組織鐵血監督團，以監督政府促進共和為名，一時入會者頗為踴躍。其後前江寧將軍鐵良自南京逃亡北返，利用其文案王先源與曾妻弟王之海的姻親關係從中活動，曾廣為遂為宗社黨重金收買，密謀暗殺袁總統，被天津巡警道楊以德部下偵知。適有該團團員蕭汝昌、陸士奎亦揭發其事，楊遂派兵警圍捕曾廣為等人，曾等拒捕，兵警高良臣、陳林枝負傷，然終將曾等拿獲，於四月二十三日押抵北京，交軍政執法處偵辦。其後曾等被判處永遠監禁，遞解回河南光山縣原籍，途中行至信陽州境，悉被戮殺⁽⁷⁹⁾。

(72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武昌電報。

(73) 民立報，元年七月五日，武昌電報。民立報，元年七月七日，鄂省之風聲鶴唳。

(74) 民立報，元年三月六日，頁7，宗社賊黨之動靜。

(75) 民立報，元年三月十三日，頁3，天津電報。

(76) 民立報，元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頁3，北京電報。

(77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九日，頁6，宗社黨何其愚耶。

(78) 東方雜誌，八卷十二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3。

(79) 參見「支那之宗社黨」（下）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1。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一日，頁6，再紀曾廣為事。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三日，頁6，曾廣為案之別報。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二日，頁7，曾廣為案近聞。又據民立報，元年七月十三日，北京電報，謂曾廣為判定監禁三年，於七月十日遞回原籍，故曾等在信陽州被殺害，當在七月十日以後。

五月十一日晚，天津忽聞宗社黨起事。據云由韓家墅兵隊勾結某衛隊同時響應，火車北道火光突起，河北槍聲激發，軍警嚴防，商民惶然⁽⁸⁰⁾。北京方面則接獲密報，謂石大人胡同與東堂子胡同大半係宗社黨人。河南都督亦來電謂確有宗社黨人勾結巡防營，圖謀不軌，已拿獲正法，並謂餘黨已潛逃至京。因此京中謠言甚多，石大人、東堂子兩胡同舖戶多遷移他處。加以天津甫生動亂，袁世凱總統遂於五月十二日密頒戒嚴令，嚴加防範⁽⁸¹⁾。五月三十一日，民立報載稱，北京內城帥府胡同某宅為宗社黨窟穴，內務部早有所聞，迭派高等偵探偵緝，均未見端倪。前日忽露形跡，經由內城巡警入內檢查，搜獲炸彈一箱，當場逮獲兩人，一穿西裝，一穿華裝，聞已緝送北京防營執法處訊究⁽⁸²⁾。

八月二十二日，孫中山先生自上海行抵天津。旋有二人面見直隸都督張錫鑾，舉發宗社黨人在北京某處謀炸中山先生。張督隨派人至京，偕同來人拿獲數人，及炸彈等件，送交軍政執法處辦理。並聞有杭、荆兩州駐防旗人數名，尾隨中山先生北上，故天津方面戒備綦嚴，凡歡迎地點皆有警隊密布把守，無歡迎證者不准擅入，且有北京軍警司令部代表陳侯寬帶高等偵探多人，與都督府田中軍所帶兵丁百餘人，作暗中保護，以防不測⁽⁸³⁾。

民國二年年初，滿人聯慶謀刺袁總統不成，被執明正典刑。據世界時報稱其人為前清皇室貴族，與肅親王善耆有姻誼，肅親王現隱於旅順左近，因與謀刺案有關，匿不敢出⁽⁸⁴⁾。一月十七日，北京步軍衙門拿獲肅親王第三子憲章，並搜獲印信等件，不日交法院審訊⁽⁸⁵⁾。一月二十三日，民立報載稱，聞日前宗社黨暗運炸彈多枚至京，圖炸諸重要人物，乘亂起事。曾寄四枚炸彈於前清宦官小德張，密令施放。小德張知事難成，一面向內務府告發，一面誘黨人至宅，已於一月二十一日晚在其宅中將黨人拿獲訊辦⁽⁸⁶⁾。

四月八日，宗社黨人榮陞自吉林抵京，居西河沿迎賓旅館。榮陞，字孟枚，滿洲人，時任黑龍江省憲法研究會委員，聞係宗社黨機關部部長。北京方面因接奉天都督張錫鑾電報，謂榮係破壞黨首領，請國務院拘拿。即由內務部轉飭警察廳，派探訪局馬瑜臣等二人將榮逮捕⁽⁸⁷⁾。數日後，榮終以查無破壞黨實據，被當局開釋⁽⁸⁸⁾。

(80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三日，頁3，天津電報。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二十日，天津戒嚴之真象。

(81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二十日，總統府之戒嚴。

(82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三十一日，頁7，內城之宗社黨。

(83) 民立報，元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天津電報。

(84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2~3。

(85) 民立報，二年一月十九日，北京電報。

(86) 民立報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北京電報。

(87) 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十一日，西報譯電。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十三日、十四、十七日，京塵飛絮錄。

(88) 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十六日，北京電報。

五月十六日，總統府得宗社黨名單，計入黨者千餘人，最重要人物為溥偉、善耆、鄂孝晉、魯璜、升允、趙亦頤。茲訂賞格嚴拿，以上六人一萬元，其次四千元，再次為二百元⁽⁸⁹⁾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北京德文報載拱衛軍司令發現煽惑人心的匿名書籍甚多，均為寄與該軍軍人者，推測投寄者為盛行於東北的排漢黨及宗社黨⁽⁹⁰⁾。

七月五日，民立報載稱，日昨天津晚車有日人吉田運送炸彈十餘箱至京，因帶有奉天都督護照，各門稅關均不甚留意，及聞係運往內城老虎洞街械姓家宅，遂實行搜查，此案乃全形破露，刻已由警察廳知照日使，一面調查餘黨。按吉田為宗社黨私運軍火，不止一次，時往來於大連、青島一帶，今竟被獲，或可探知宗社黨內幕。惟械某已聞風遠颺，現仍在緝捕中⁽⁹¹⁾。七月九日，京師警察廳在北京齊化門拿獲宗社黨人毓廉⁽⁹²⁾。同日，北京德文報載北京巡警在東城齊化門外一滿人住屋中捕獲數人，均來自東北。其中有二人為宗社黨首領，又搜獲炸彈、禁書、龍旗，悉數充公⁽⁹³⁾。此事是否與毓廉被逮有關，或兩者係為同一件事，已無法確知。八月三十一日，京師稽查處查獲宗社黨運動者葉崇渠、馮伯熙，均送交軍政執法處，處以死刑⁽⁹⁴⁾。

至於熱河方面，因地處邊隅，民風保守，厭新喜舊；加以熱河陸軍本由滿洲旗營改編而成，因此極易為宗社黨所煽惑，致生變亂。

清宣統三年秋天，有候補道李龍彰者，隨新任熱河都統錫良到熱。時值武昌起義，各省紛紛響應，熱河學界欲發起保安會，以維持地方秩序暨贊助共和。李龍彰却暗中破壞阻撓，錫良遂委李為兵備處總辦。及至清帝退位，共和確立，李又極力反對，每至陸軍輒對軍人演說忠君愛國等辭，並謂清國待民不薄，遭此意外，旗人殊為可惜。熱河陸軍多被其說動而深懷種族激情。是以民國元年春夏以來，該軍每逢剪髮之人，即目為革命黨而仇視之，若非餉項充足，幾至被其煽變⁽⁹⁵⁾。

民國元年四月六日，袁世凱以熱河為滿洲重鎮，或為宗社黨所覬覦，特命姜桂題為熱河都統，藉資鎮懾，姜未到任以前，仍着崑源署理⁽⁹⁶⁾。十一月三日，民立報駐北京特派員電稱，中國公報昨載熱河都統崑源電報，謂近在阜新縣拿獲宗社黨石玉廷等數名，併搜獲龍旗告示，交朝陽府嚴究⁽⁹⁷⁾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熱河混成協第三大隊長韓玉奎

(89) 民立報，二年五月十八日，北京電報。

(90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3。

(91) 民立報，二年七月五日，燕市燃犀錄。

(92) 民立報，二年七月十一日，北京特電。

(93) 同註(90)。

(94) 同上。

(95) 民立報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，頁7，水深火熱之熱河。

(96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八日，頁3，總統命令，北京電報。

(97) 民立報，元年十一月五日，北京電報。

受宗社黨委囑，連絡當地軍隊及北京禁衛軍，俾暗殺袁總統趁機興復清廷。其通信處設於奉天萬壽寺、北京門外打磨廠鴻興客棧、萬壽山宦官張宅、海淀興榮米店等地。韓除却以大量金錢收攬熱河軍心，並派心腹耿亮、白勝、繼景三人携黨員名簿要求與熱河軍人歃血爲盟，爲偵探長錢錫霖偵知，立將耿、白、繼三人逮捕處決。惟韓以大隊長身分及罪證不足而倖免，且得繼續擔任現職⁽⁹⁸⁾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民國政府改任熊希齡爲熱河都統。原任都統崑源，係滿洲人，素爲軍民所推戴，此次被解除職務，熱河軍人甚感不平，咸認中央有意排斥滿人，終致民國二年二月十七日深夜熱河混成協第三大隊（又謂第三營）發生暴亂。這次暴亂固與崑源解職有關，但其真正原因還是宗社黨人在熱河軍中多方活動的結果所促成，前述李龍彰、韓玉奎事件可證。韓玉奎自民國元年夏天住灤屬三道梁子，即着手勾結黨羽，設立機關，名曰忠正會（有謂爲忠義會者），會衆經常在營中秘密會議，圖謀不軌。原訂二月二十日起兵，但二月十六日韓玉奎在灤州被捕，翌日，解至郡街。其會衆唯恐事洩，遂於是日發動暴亂。當暴亂時，亂兵皆腰圍黃帶，作爲宗社黨徽章，以忠義二字爲暗號，先在市街繁華地區放火，一時電報局、巡警總局火起，光燄熊熊，槍聲連續不絕，合市驚疑。繼而亂兵直入財政局，分攫所存金錢，並劫掠一般居民；隨與官方討伐軍接戰約三小時，始向內蒙古方面逃竄。據稱此次熱河兵變共有一百零九戶住家被燬，官軍、亂兵各有四五十人死傷，實非一時突發的小型暴動所能比擬⁽⁹⁹⁾。

暴亂平定後，新到任的熱河都統熊希齡電呈政府，謂前次熱河兵變，查實宗社黨所爲，匪首德亮現已拿獲，供認不諱，並供稱同謀作亂者尚有軍官常和、伯勝二人，宗社黨勾結兵隊，均係此二人從中運動爲之主謀，蓄志已久，黨羽衆多，非嚴行緝捕，按法懲治，不足以定靖餘孽，請將常和、伯勝革職，歸案訊辦，以便追究餘黨。又謂熱河經此次變亂，兵士驕橫尤甚，請將熱屬作爲軍事區域，地方官加給兵備處提調銜，以便管轄，易於服從⁽¹⁰⁰⁾。三月十七日，熊希齡又電稱，近日圍場廳地方，有匪徒私立鳳凰教名目，與宗社黨暗相勾結，希圖起事⁽¹⁰¹⁾。足見熱河宗社黨人的活動，並未消沉。

4. 山東省

民國初年，山東由於恭親王溥偉及一批遺老寓居青島，志在匡復，加以前清署兩江總督張勳駐兵兗州，表面上贊成共和，接受民國任職，實則眷懷清朝，暗圖復辟。故山東宗社黨頗受鼓舞，活動亦甚爲積極。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一日，煙台方面電呈政府，謂

(98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2。

(99) 參見同上。及民立報，元年三月五日，熱河兵變特報。

(100) 民立報，二年三月九日。頁6，熱河之餘波未平。

(101) 民立報，二年三月十八日，頁6，北京電報。

(102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，頁3，北京電報。

張勳、王寶山在兗州、嶧縣一帶募兵數千，聞欲與宗社黨連合，求總統速設法解散，以保大局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青州駐防旗兵暴動，與官吏衝突，致死傷官吏十一名。經新任副都統熙臣力為鎮撫，將主謀者增繼、春波、緒岱、緒遂等十三名拿獲偵辦，彼等供認係受青島宗社黨首領所唆使，訊明後即將增繼等三人槍決⁽¹⁰³⁾。十二月二日，民立報記者自濟南電稱，山東都督周自齊奉國務院密電，謂宗社黨人善豫、德麟、毓廉等潛行至山東，秘密勾結，意圖破壞共和，飭嚴密查拏。現巡警道密飭所屬訪拏，每名懸賞千金⁽¹⁰⁴⁾。十二月二十六日又電稱，青州郭都統掌獲宗社黨首領長林，並其黨羽四名，已審明正法⁽¹⁰⁵⁾。

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，濟南城內各處出現大批告示，告示內容略謂現在革命黨雖舉奸臣袁世凱為大總統，創立共和政府，然實為中國數千年來未曾見過的政體，無君臣之別，父子之情義，比起所謂鬼畜等沒德背理的政體猶有過之。加以黨爭日盛，內訌紛亂不絕；內則清廷逆臣袁世凱已有黃袍南面稱帝的野心，外則列強環伺，欲乘亂瓜分中國。當此萬分危急時期，亟應誅戮叛臣袁世凱，並討伐抱持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，力圖興復大清皇室，違者將格殺毋論，累及九族⁽¹⁰⁶⁾。

四月七日夜，駐山東陸軍第五師忽下緊急命令，排隊四出，直至天明方歸。就各方面探其原因，約有下列數說：(一)謂第五師師長靳雲鵬在省內偵悉宗社黨機關，且獲證據，牽連張勳。(二)謂津浦路兗州車站電省，張勳所部數千人乘車北上。(三)謂國會開幕在即，第五師官兵係受某當道人士意旨，預為防範。原因複雜，難得真象。第五師中心點本屬通行大道，四月八日宣布戒嚴，禁止人民往來，四圍營垣兵士荷槍密布。西南傍津浦鐵路處有少數兵隊潛伏，防範綦嚴。夜間仍四出巡邏，通宵達旦，如臨大敵。都督府亦取締人民通過，各城戶均增加兵警，晚上七點，遂行鎖閉，杜絕出入。濟南陸軍第九十四團，一向駐紮省城外東北隅，四月九日清晨，全行調集辛庄（第五師駐紮地）。第五師分駐濰縣的第十七團，則於四月十日午後電調至省城，增加兵力，以備抵抗。距辛庄二十餘里津浦鐵路車站黨家莊，亦駐有馬兵，凡南來車次必令停止嚴查，以防危險物品潛越，附近鐵道均埋伏地雷，以資防禦。

濟南內外商民見此情景，互相傳布，有謂軍隊譁變，有謂張勳將攻濟南，有謂南北

(103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3。但據民立報，二年一月四日，青州兵變之結局，却謂謀亂者係大增等十二人，其中春波、緒岱、小結、純子、長林五人被捕處決，大增之子於暴動當夜傷斃，小印、小奈二人聞畏罪服毒自盡，大增、春多、春普、緒遂四人則潛逃他處。

(104) 民立報，元年十二月四日，山東電報。

(105) 民立報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山東電報。

(106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3。

將啓戰爭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周自齊、靳雲鵬並銜出示誥誡，謂武昌起義後，軍隊奔走彈壓，操練久疏，近日調集軍隊，演習夜戰，亦軍中常事，爾等商民各安生業，毋生恐怖。又聞張勳曾致電詰責，謂其部下聞省內疑忌防衛，均驚問理由何在？同是民國軍隊，何歧視若此。若謂防範南軍，南北統一已一年有奇，正式國會已經成立，又何必有防範必要。周某、靳某既見外吾等，吾等誓必與其一決雌雄。當經再三開導，將校仍憤憤不平。周自齊接電後，特於四月十五日乘車赴兗州，與張勳解釋誤會等情由⁽¹⁰⁷⁾。

四月十一日，民立報自北京特電，謂日前濟南城出現一偽示，末署張勳、清恭王溥偉名，並蓋恭印，昨袁總統詢問溥倫，謂確係恭王真印。或謂溥偉與洪述祖（宋教仁被刺一案重要嫌犯，前內務部秘書）俱匿青島，該偽示係洪所書，藉以煽惑人心⁽¹⁰⁸⁾。由此可見，濟南的戒備嚴防，確與宗社黨人活動有密切關連。

5. 江 蘇 省

江蘇的南京、上海，亦為宗社黨活動的重要地點。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南京陸軍部總長黃興電飭各省都督及管內陸軍當局者，謂風聞宗社黨人現從北方潛來，往來於南方各處，煽惑軍隊，頗思擾亂，圖謀不軌，凡我軍界指揮與軍事當局者，應速設法嚴加防範⁽¹⁰⁹⁾。四月十日晚，駐南京憲兵隊密約陸軍部人員，至留守府附近三盛客棧拿獲宗社黨九名，並於其房內起出軍服、軍帽、手槍、炸彈暨危險物品多件，另有符號五十餘張，均蓋有偽印，悉送留守府懲治⁽¹¹⁰⁾。

五月八日，駐鎮江之江蘇陸軍第十六師師長顧忠琛出具示諭，略謂民國成立，五族一家，乃有無識愚民受少數宗社黨人煽惑，潛伏各處，散布流言，妨害人民，國法所不容，神人所共憤，南北各省業經一體嚴拿，盡法懲治。京口為水陸交通之地，中外互市之區，本師長任事以來，隨時面諭各軍隊嚴密巡緝，以杜亂源。近聞仍有該黨人潛來嘗試，散住城鄉內外，妄思擾亂治安，似此居心叵測，豈可稍予姑容，為此示諭各界人民，一體知悉等等。並號召宗社黨人輸誠自首，當為其削除黨籍，不究既往；否則，國法具在，決不寬赦⁽¹¹¹⁾。五月十四日，民立報載稱，駐鎮江輜重第十六營第一連第三排排長程海帆，有串通宗社黨煽惑軍心希圖作亂情事，為駐鎮憲兵第一營營長韓天蔚查獲，當即拘送第十六師司令部，由執法官訊供確實，稟請師長顧忠琛發令，於五月十日午後在師部門首槍決，以儆效尤⁽¹¹²⁾。

(107) 以上所述濟南風聲鶴唳等情景，均見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十九日，頁8，濟南通信。

(108) 民立報，二年四月十三日，北京電報。

(109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5。

(110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十三日，頁6，南京通信。

(111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日，頁8，鎮江通信。

(112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四日，頁8，鎮江通信。

六月五日，南京留守黃興派衛兵捕獲宗社黨多名，訊供結果，與第一百零二團兵士牽涉，當日即將該團團長章武收押⁽¹¹³⁾。章武前曾組織同盟改進黨，後與漁業統一黨機關部合併。漁業統一黨發起人姜眉華、曹醒吾、廖濱甫、高錦山，純為實業家，該黨黨員幾全為沿江一帶的青幫。嘗以保護漁業為名，購進昔日北伐隊所交卸的槍械彈藥，並分配給同盟改進黨、百二團、大公黨、自強黨，勢力日漸壯大。其時正發生南京留守黃興的退職問題，該黨即趁機散布流言，煽惑軍心，南京軍隊大為動搖，遂有百二團的謀變，致南京秩序大亂。為此，黃興特命第三師第九團出動戡亂，並捕獲巨魁常庚、戴延榮、柏光威。即由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為裁判長，第六旅旅長張斯磨、第十六旅旅長趙恒惕、司法員陳登山等為陪審員，組成臨時軍法會議，進行審問。據彼等供稱，全黨人數甚眾，期以沿海、沿江一帶為舉事區域，預定先將舉事區域內各官公署燒燬，對各大官斬殺，完全占領各地，然後再與北京宗社黨聯合，顛覆共和政府，奉戴大清皇帝正位。故漁業統一黨所經手購買武器的款項，均係北方宗社黨人所提供。審問結果，常庚、戴延榮、柏光威、百二團排長陳振生、大公黨總理徐鐵漢、自強社首領湯虎，及其他兵卒十一名，悉被槍決⁽¹¹⁴⁾。

六月七日，黃興通電湖南、湖北、江蘇、安徽、上海各省區，將已設立的漁業統一黨一律解散⁽¹¹⁵⁾。七月一日，民立報載稱，南京巡警局隊官戴君，拿獲宗社黨八名，並搜出宗社黨符號，係銅質的金面牌，上鑄一龍，龍下又鑄有兩支槍，係交叉形，刻正秘密審訊中⁽¹¹⁶⁾。

民國二年，上海發現宗社黨月份牌，上印民國二年受命天子等字樣，下繪宣統小像，左右畫各王公各國公使拜賀等事。並於新北門內陳茂記、愛蓮堂、飛雲閣等各花紙店抄出大量違禁物品，各店主均被逮捕⁽¹¹⁷⁾。同年二月十二日，民立報載稱，駐瓜洲長江水陸各營統帶趙洪喜，因近來沿江各鄉鎮謠傳有宗社黨匿跡為害地方等情，若不預為防範，恐於治安上大有妨礙，故於昨日通飭駐防各屬水陸軍隊，如遇不法之徒造謠生事，應即從速押解來瓜洲，稟請軍長按照舊例軍法從事，以安人心，而息流言⁽¹¹⁸⁾。

6. 浙江省

民國元年四月八日，浙江軍政府警備隊在杭州車站拿獲行跡可疑者三名，聞係宗社

(113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六日，南京電報，惟原文作一百零一團，實為一百零二團之誤。

(114) 同註 (109)。

(115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八日，頁3，南京電報。電文見吳硯雲編：黃留守書牘（臺北，文星，民五十一年），卷下，頁9。

(116) 民立報，元年七月一日，金陵之宗社黨。

(117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21。

(118) 民立報，二年二月十二日，頁8，鎮江通信。

黨人。同日，即將其中沈邦祥、沈邦彥二人處決⁽¹¹⁹⁾。

五月十五日，杭州警署偵探隊隊長孫人鏡，在杭州車站發現一形跡可疑的旅客，經調查係為宗社黨人。而該旅客所携皮包內有上海共進會票據，上書擔保貴冑英雨亭、文瑩等，發起列名會員為張德明、墨熙、風聲、宗福、鄭景標等。並有入會人李建章誓書一紙，照錄如下：立誓書，李建章，年三十九歲，住上海麻忽路，原籍直隸保陽人，係漢種人，素抱剪除民賊，挽救瓜分，酬報皇恩，推倒民國宗旨，願在共進會部下舍身立業，一切聽大皇帝指揮。入會之後，嚴守秘密，決無反復，如有違背情事，照會章處罰，立此誓書是實。宣統四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李建章（下署指印）⁽¹²⁰⁾。

五月十八日，民立報載稱，紹興軍政府分府前接省垣密函，謂有宗社黨暗遣心腹，南來運動軍隊，潛謀不軌。經王分府派員偵查，獲悉分府錄事樓靜安係其羽黨，遂將樓拘押，並搜出名冊等件，訊明後即將樓處決。至於樓所供出徒黨七名，因均係某營兵士，王分府未肯波累，乃不深究⁽¹²¹⁾。

7. 安徽省

民國元年四月十三日，安徽拿獲宗社黨人張達，供稱有同黨二、三十人，在南京、浦口一帶，散布謠言，煽惑軍心，圖謀起事⁽¹²²⁾。同日，民立報自安慶特電，謂有宗社黨人張鵬、運動皖軍，圖謀不軌，經葛旅長目兵拿獲，送交軍政府，訊實槍決⁽¹²³⁾。

五月三十一日，又有呂文卿其人，在安慶城內逗留；呂因與當地憲兵隊稽查周翼之為知交好友，遂勸誘周加入宗社黨，周假意贊同，暗中却向司令官宋植楠報告。安徽都督柏文蔚即命憲兵隊至西門外呂所寓王昆鰲宅將呂拘捕訊問。據呂供稱，他是二十七日去蘇州旅行時，受該地黃芝卿勸誘而入宗社黨，該黨本部在上海，黨人募集長為萬仲昆等情⁽¹²⁴⁾。經憲兵司令處訊明屬實，即於六月四日將呂槍決⁽¹²⁵⁾。六月六日，傳聞有宗社黨代表黃芝清（卿？）至安慶活動，軍警正擬嚴行緝拿⁽¹²⁶⁾。

民國二年三月二日，有九華山匪徒三名在安慶城內被捕，彼等懷中皆藏有忠義堂徽票。安徽都督柏文蔚即從此字義推測，認為彼等匪徒係受宗社黨收買，立命槍決，並飭令當局衙門今後應嚴緝匪徒⁽¹²⁷⁾。

(119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九日，杭州電報。及民立報，元年四月十一日，杭州通信。

(120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八日，頁7，杭州發現宗社黨。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5~16。亦有記述，與民立報所記，稍有出入。

(121) 民立報，元年五月十八日，頁8，紹興通信。

(122) 東方雜誌，八卷十一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1。

(123) 民立報，元年四月十五日，頁3，安慶電報。

(124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6。

(125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六日，頁3，安徽電報。

(126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七日，安徽電報。

(127) 同註(124)。

8. 湖 南 省

民國元年四月十三日，傳聞有宗社黨混雜於長沙城內，煽動當地軍隊。該黨人衣裏印有血痕手指，並以大事已成，頭品頂戴、官上加官等語為暗號，一時謠言紛起。為此，湖南都督譚延闓命軍務司嚴加偵查，結果發現有姚子楷者自漢口密運武器，暗藏於城內易宗謙宅，並散發大量金錢，煽動長沙軍隊，計畫燒打都督府。因派員前往逮捕，姚子楷急捨武器而逃⁽¹²⁸⁾。

六月二日，民立報載稱，連日以來，長沙皇倉街德昌荒貨店發現大宗槍彈。乃將該店封釘，將店主拘拿訊辦。另在阿彌街內緝獲宗社黨張某等三名。又在張鶴齡之姪張某家中搜獲軍械甚夥，當將其解送審判廳訊辦⁽¹²⁹⁾。六月二十三日，辰州府駐防軍隊拿獲匪徒三名，內有盧有才一名，自認為宗社黨，並謂受該黨主使，有能焚燬該府署者，酬以五百金等語⁽¹³⁰⁾。

七月一日，有張定一者，與西洋雜貨商在長沙城內樊西巷藝徒學堂前開設厚記公司，而其時漢口宗社黨人多潛來該地，以重金收買軍隊，與通聲息，致謠言頻起。由於張定一舉止極為可疑，當地巡防隊乃搜查其家宅，然張早已潛逃，惟宅內留有騎兵用刀劍五十把，手槍四十支，炸彈二枚，悉予收押。湖南陸軍第四師師長王隆中為防止人心動搖，特頒告示告誡軍人，切勿為宗社黨所愚，而自蹈罪禍⁽¹³¹⁾。

9. 河 南 省

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三、四兩日，宗社黨人金子敬至開封城內，肆行殺害當地剪除辮髮者，致人心動搖，其中師範、高等二學堂學生，因驚恐過度，悉數披髮。河南都督張鎮芳、護軍使雷震春遂頒戒嚴令，省議會亦暫時休會。二月二十七日，居住於開封府的旗營，因受北京宗社黨煽動，與當地巡防營通款，反對與南京政府講和，擬暗殺各大官，每夜在開封城外的滿城聚嘯，情勢極為不穩。張鎮芳見狀，不欲彈壓而生衝突，派城守尉德啓前往撫慰，軍心始趨平靜⁽¹³²⁾。

六月三日，開封城內赤十字社支部長耽繼善，以宗社黨罪嫌被捕處決。耽繼善本名繼善，滿洲鑲紅旗人，為前清河南候補道。民國以後，為免漢人忌視，改名耽繼善，得北京本部許可任赤十字社河南支部長，回開封後住八旗會館，利用赤十字社名義，暗中募集宗社黨員，被當局發覺，致遭此殺身之禍⁽¹³³⁾。

(128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6。民立報，元年六月二日，長沙通信。

(129) 民立報，元年六月二日，長沙通信。

(130) 民立報，元年七月十日，長沙通信。

(131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6~17。

(132) 同上，頁14。

(133) 同上。

民國二年七月，開封宗社黨乘二次革命爆發大肆活動，奔走勾煽。有十名黨人在鼓樓街慶陞店爲河南軍警所逮捕，其中李祥辰、王老三、張全才、于得水、邢金善、梁書祿、馬明道、周明德八人，確係肅親王善耆所派者。以上八人，悉於七月二十七日槍決⁽¹³⁴⁾。

10. 山西省

民國元年十一月十日，太原府軍隊呈現不穩，盛傳有宗社黨人混跡其中。經都督閻錫山嚴加調查，發現工藝局委員王錫山及郵政局書記金子通二人，受北京宗社黨囑託，設法收集武器，並煽動軍隊。判明之後，即將二人處決⁽¹³⁵⁾。

11. 陝西省

民國元年七月十九日，西安某燈舖內發現一官銜燈，上書欽加五品銜民政部主事禁煙公所委員字樣。陝西當局追究之下，始悉燈主爲謝奎，甘肅人，經都督張鳳翽加以盤問，謝奎謂同行來陝者尚有舒景福，旋將謝開釋。七月二十一日，張鳳翽忽接陸軍總長段祺瑞密電，內稱舒景福(陝西人)、王耀武(陸軍畢業生)勾串宗社黨，於陰曆五月二十八日(七月十二日)到陝甘活動，圖謀不軌，除致電甘肅都督趙惟熙查拿外，着陝西嚴加查緝。張始憶及謝奎所言，急派衛隊於七月二十二日在馬房門某客棧拿獲舒景福及曹某，並曹某義子與某山東人共四名，搜出密函、宗社黨簡章多件。當將舒等四人處決，並派馬隊追緝謝奎⁽¹³⁶⁾。同年八月初，西安傳有宗社黨十二名密謀作亂，傾覆民國，被獲八人，卽置典刑，餘均逃逸⁽¹³⁷⁾。

12. 甘肅省

清宣統三年九月初一日(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)，陝西新軍起事，響應革命，成立陝西軍政府，推張鳳翽爲都督。原任陝甘總督升允(蒙古正白旗人)由西安逃往甘肅，清廷命其署理陝西巡撫，督辦軍務⁽¹³⁸⁾。

爲了對付陝變，清廷一方面調毅軍扼守潼關，另一方面責成陝甘總督長庚分兩路出兵，進攻陝西民軍。長庚卽命升允率寧夏鎮總兵馬安良部組成北路軍，向長武進發，作正面攻擊。另由固原提督張行志指揮南路軍，進窺鳳翔，企圖從側面牽制陝西民軍。陝西軍政府得訊，卽由兵馬大都督張雲山督師長武，另由副統領萬炳南率馬、砲及衛隊十餘營，前赴鳳翔，分防隴、寶。於是，陝西民軍與甘軍迭戰於邠、岐之間，互有勝負⁽¹³⁹⁾。

(134) 民立報，二年八月七日，頁8，開封通信。

(135) 同註(132)。

(136) 民立報，元年八月五日，頁7，陝西拿獲宗社黨。

(137) 白蕉：「宗社黨」，人文月刊，六卷九期，頁13。

(138) 張國淦：辛亥革命史料，頁212。

(139) 郭希仁：「從戎紀略」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，第二編，第五冊，(臺北，中正，民五十三年)，頁91~92。

民國元年二月間，升允所率甘軍越過乾州，攻克醴泉，進窺咸陽，陝西民軍漸感不支。其時清帝已宣布退位，然升允秘不使部下知曉，攻咸陽益急。其後，升允所部主將馬安良得張鳳翽函電，始知退位詔書已下，因詰升允曰：「清帝已退，吾爲誰爭？欲令吾輔爾爲帝乎？」⁽¹⁴⁰⁾適統領趙倜、張鳳翽相繼到乾州，與馬安良訂議和條件。至三月三十日，升允以進退失據，離陝折回蘭州，所部回軍亦皆解散⁽¹⁴¹⁾。

同年七月二十九日，甘肅都督趙惟熙致電北京政府，報告升允近況，謂升允閉口躬耕，並無他意，似對升允有所袒護。然根據蘭州方面報告，升允刻在蘭州，雖承認共和，而心仍在舊清，近日且組織一會，名曰秘密保清會，升允被舉爲會長。該會會員並前往寧夏、蒙古，連絡前陝甘總督長庚，煽動哈薩克纏頭首領，圖謀恢復清室⁽¹⁴²⁾。其後升允則往來於東北、蒙古、陝、甘、等廣大地區，勾結滿蒙王公貴族、旗軍殘部和秘密會社，組織「勤王軍」、「滿蒙舉事團」等，成爲復辟派在北方的實力人物⁽¹⁴³⁾。

民國二年四月七日，升允行抵庫倫，與外蒙各大臣商議，會同俄國一併出兵，共討袁世凱。計畫以俄、蒙之兵自北路進攻張家口，東三省滿蒙聯兵進攻山海關；另由升允督率甘肅漢、回各軍及寧夏涼州旗兵，分路進取西安、太原；其綏遠、歸化等處旗兵，自能聯合一氣，入衛京師，仍奉宣統皇帝復位⁽¹⁴⁴⁾。因此，升允分別致函甘肅都督趙惟熙、隴東護軍使張行志、寧海鎮守使馬麒、隴東鎮守使陸洪濤、寧夏護軍使馬福祥、綏遠城將軍張紹曾、熱河都統姜桂題等人，勸誘籠絡，不遺餘力⁽¹⁴⁵⁾。

同年六月間，升允忽印刷檄文，在蒙古各地張貼，文首自署清陝甘總督，文內則自稱幕府。略謂幕府問道北赴庫倫，與俄國、蒙古協約，共誅叛我清室者。又謂民國不能久據，清室必將中興等等。甚至風傳升允率領舊部及庫倫兵隊，衝入內蒙，擬向歸化一帶進攻⁽¹⁴⁶⁾。七月六日，俄國沙皇派參謀抵庫倫，邀升允即日赴俄，商議組織庫倫完全政府，並推薦升允爲總理⁽¹⁴⁷⁾。以後則消息多有所闕，其活動詳情，遂少爲人知。

以上所述，極爲瑣細，雖所蒐集資料缺略不全，然民初宗社黨個中情形，其實亦不過如此。東三省、蒙邊以連絡土匪及受外人庇護，故黨人活動，似稍有聲色，其他除湖北省以外，實多爲空氣作用，未產生任何的影響。

(140) 同註(138)。

(141) 東方雜誌，八卷十二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8。

(142) 「支那之宗社黨」(下)，支那，四卷十三號，頁14~15。

(143) 劉望齡：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辟和反復辟鬥爭（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），頁63。

(144) 升允：「致嘉木養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152。

(145) 各函俱見劉鋒輯：「升允復辟陰謀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147~158。

(146) 東方雜誌，十卷二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1~2。又升允所發檄文共有三篇，係由哈爾濱租界俄國報館代爲製印，原文俱載民立報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。

(147) 民立報，二年七月十四日，北京電報。

(三) 日本與宗社黨的接觸——「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」

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，夙持大陸政策，志在攫取中國大陸的種種權益。辛亥革命爆發後，日本朝野皆極為重視中國局勢的發展，惟其時日本各方對於辛亥革命的態度並不一致。大體而言，民間頗多主張援助革命黨，而當政的西園寺內閣則傾向於維護清廷，至於陸軍則醉心於所謂「滿蒙獨立計畫」，藉以瓜分中國，其目的乃在獨佔南滿利益，進而奪取內蒙⁽¹⁴⁸⁾。因此，在清廷退位前夕，日本陸軍部便積極部署滿蒙獨立，由著名的大陸浪人川島浪速從中牽線，所拉攏扶植的主要對象則為宗社黨的領袖肅親王善耆。

善耆（一八六五～一九二二），字艾堂⁽¹⁴⁹⁾，自號偶逢亭主⁽¹⁵⁰⁾，係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十世子孫，歷任副都統、護軍統領、步軍統領、御前大臣、崇文門稅務衙門監督、工巡局管理事務大臣、理藩院管理事務大臣、民政部尚書（大臣）等職⁽¹⁵¹⁾。在清末親貴中，素具賢名，為有數之人物⁽¹⁵²⁾。清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七月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德宗、慈禧倉皇西走，善耆即扈從兩宮至西安，被任為御前大臣。旋奉命回北京視察情況，同年十月出任崇文門稅務衙門監督。時日人川島浪速亦在北京，替日軍掌理治安，據貝勒毓朗之弟毓盈記載：

川島名浪速，東鄰君子也，初隨聯軍到京，寓東城大市街三條胡同恩宅，秋毫無犯，一日兵誤毀一木橙，川島乃召房主人，與之道歉，問索賠若干，罰其兵給之。時八國之兵分踞四城，擾攘無已，時聞侵占人所有物，無敢過而問者。今川島待人如此，愈感之，恩姓與余家為姻婭，故知之稔。喬可勇馬之在順天府署理警政也，不通中國語，假手繙譯紳士，多為所蔽，人怨之。喬口去，乃易川島，司北京警政⁽¹⁵³⁾。

川島自繼喬可勇馬司理北京警政，表現卓越，以致聲名鵲起。一日，善耆由瑞澂（後任湖廣總督）伴同，突至三條胡同軍隊宿舍造訪川島，相與款談，翌日，川島亦赴善耆寓所答訪⁽¹⁵⁴⁾，是為二人訂交之始。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和議成立，聯軍撤退，交還警權。同年七月，清廷遂令各省設巡警軍，並於北京創設警務學堂，派川島

(148) 林明德：「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」，中研院近史所集刊，第四期，頁413。

(149) 橋川時雄：《滿洲文學興廢考》（雕龍叢鈔之二），頁60。

(150) 金梁：《光宣小紀》（臺北，廣文，民五十七年），頁83。

(151) 「肅親王年譜」，石川安次郎：《肅親王》（東京，警醒社書店，一九一六年），書前。

(152) 魯普達：「談善耆」，古今半月刊（香港，龍門書店影印），第十八期，頁21。

(153) 毓盈：《述德筆記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七年影印），卷四，頁2。

(154) 川島浪速：《肅親王》（一九一四年五月編印），頁18。石川安次郎：《肅親王》，頁45。

爲學堂監督，撥款六萬元爲一年經費，選擇學生五百名入堂肄業。其學期定初等科三月，中等科一月，高等科兩月，畢業後即派充巡捕，其品行學業均優者，拔充巡捕長；並由川島返國延聘日本警察長稻田穰爲警務教習。同年十月，清廷又挑選八旗官學生三十名，令川島、佐藤、內藤、小平等人督率，前往東洋警務學堂留學⁽¹⁵⁵⁾，可以說是中國警察教育的濫觴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四月，清廷爲謀警務事權的統一，將北京所有的警務處、協巡局等名稱廢除，改設工巡局，以善耆爲工巡局管理事務大臣。善耆上任後，銳意整頓警務，聘川島爲最高顧問，並保薦爲二品官，知遇之隆，前所未見⁽¹⁵⁶⁾。善耆在職年餘，頗有建樹，然終以裁廢步軍統領衙門事遭致反對而去職，改任藩理院管理事務大臣。至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五月，出掌民政部（其前身爲巡警部），前後五年，在警察制度上又有許多革新。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八月，革命軍大起，善耆憂心如焚，極思振衰起敝。同年十二月初一日（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），隆裕太后爲磋商清帝退位事而召開御前會議，與會者有載灃、溥偉、善耆、載濤、載潤、載澤、毓朗、那彥圖、貢桑諾爾布等十四人，其中只善耆、溥偉、載澤等四人敢於發言諫阻，餘皆三緘其口⁽¹⁵⁷⁾。關於御前會議情形，金梁也有記載：

南北和議，必決讓國，太后召集皇室會議，歷訴苦衷，聲淚俱下，待衆以決，皆相視無言。惟恭、肅二親王，合詞諫阻，恭尤慷慨，怒斥諸貴要平日專橫，值此危亡，何皆束手？今大勢去矣，總當自奮，寧死不敢奉詔。不待畢議，即辭而出⁽¹⁵⁸⁾。

其時川島浪速已在北京從事活動，先擬暗殺袁世凱，不成，遂謀擁肅親王善耆出奔東北，並促內蒙古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舉兵與善耆會合，以建立滿蒙獨立王國。該項計畫係由川島一夥人負責主持，日本陸軍則派遣高山公通大佐、松井清助大尉、多賀宗之少佐至北京，協同川島進行，另有北京守備隊隊長菊池武夫暗中相助。同時，他們也一方面在東北當地進行促使張作霖與其互相呼應，另一方面則以強力訴諸參謀本部促其影響關東都督府，給予他們最大的便利和援助。民國元年一月三十一日，川島覆電參謀本部，電文開頭有「謝謝訓電並拜讀，極細心的計畫，必須注意無所遺漏，至於有關舉兵意見，具體陳述如左」等語。川島所陳述的起兵意見，即是表面上由清人自由行動，暗中

(155) 張壽鏞編：《皇朝掌故叢編》（臺北，文海影印本，民五十三年），外編，卷四十，頁2。

(156) 朱子家（金雄白）：「肅親王與川島芳子女」，香港，《春秋雜誌》，第九十六期，頁19。

(157) 溥偉：「讓國御前會議日記」，辛亥革命（上海，中國史學會，一九五七年），第八冊，頁112~114。

(158) 金梁：《光宣小紀》，頁153。

則由日本執其牛耳，而對俄關係多少加以調整，如此對外就無所掛慮，縱然中國的「分割無法達成，可是滿蒙已形同我手中物了。」川島又向參謀本部陳訴，說得到情報，三原大佐、津久井少佐及其他日人正在「滿洲」方面肆行指導和援助革命黨，由於彼等活動與其計畫實相衝突，所以希望即行調查和取締⁽¹⁵⁹⁾。

二月二日傍晚，川島和高山公通等人遂把善耆偷偷弄出北京，日本外務當局接報，即與陸海軍當局協議，授予旅順官憲保護善耆的充分便宜之權，但促其注意，盡可能地不要做得太過明顯。二月六日善耆一行抵達旅順，都督府依照事先與川島所商洽的，提供當地民政長官的宿舍作為善耆居所，對其相當禮遇。二月十六日，川島前往奉天（瀋陽），居瀋陽館。十七日，川島曾先後三次致電參謀本部，報告滿鐵方面及革命黨的活動，並要求予以阻止。同時也陳述了張作霖的態度。二月十八日，川島又向參謀本部報告了張作霖的動向、滿鐵方面及革命黨的狀況，趙爾巽總督對民國的態度，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對策，於是川島一派人在奉天舉事的時機越發成熟了⁽¹⁶⁰⁾。

然而滿洲獨立計畫旋因東三省總督趙爾巽、奉天實力派軍人張作霖（時任奉天巡防營統領）轉變態度，而遭到極大的困阻。趙原本忠於清廷，武昌起義後，趙積極取締革命黨的活動，甚至再三要求日本方面協助彈壓革命黨；張也顯示出對日本更加接近的態度，且曾透露有推戴善耆依附日本的意向，其實張的本意是在利用被利用的情勢，企圖在日本的軍事援助下擴張自己的勢力。詎料清廷退位後，情況即大為不同，趙、張等人竟被袁世凱方面說服，轉而擁袁。張作霖變卦的原因，據當時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說，是張被袁以「數萬金的贈賄」、「賞賜軍刀一把及其他高貴物品」所收買⁽¹⁶¹⁾。此外，日本駐奉天陸軍代表三原等人，對革命黨多方援助，也使張產生極大的反感⁽¹⁶²⁾。二月十六日，英國駐日大使麥克納德奉其政府命令照會日本政府，促其對於離間東三省的運動再作考慮。英國不僅指出「某些清廷皇族（指善耆）策動趙爾巽在東三省搞獨立運動」，並且明知其為日本政府在幕後操縱而要求日本「通過駐奉天總領事勸告趙爾巽中止這個運動」⁽¹⁶³⁾。

二月二十一日，落合謙太郎也密電日本外相內田康哉，報告有關川島一派人在奉天活動情形，料想係為宗社黨運動而來；然川島等人「與本館不僅全然沒有聯繫，且迴避我警察的視察，雖然高山大佐與本官互通消息，可是其他人的行動，本官不能知悉。而彼等未與本官聯繫之人與本官的方針相違時，或有發生極不期望發生的事態之虞。」要

(159) 參閱栗原健：對滿蒙政策史之一面（東京，原書房，一九六六年），頁141。

(160) 同上，頁142。

(161) 古屋奎二：蔣總統秘錄，第三冊（全譯本，中央日報社，民六十四年），頁198~199。

(162) 宋越倫：「日本侵華之一貫性」，華學月刊，第六十期，頁23。

(163) 同註（161），頁199。

求今後對此類事情應由有關方面來訓令指示，務期慎重才是⁽¹⁶⁴⁾。日本政府爲情勢所迫，乃不得不有所表示，於是，內田康哉於二月二十二日致電落合謙太郎說：

有關第一四〇號之貴電，已注意其趨向，並預爲處置。關於與宗社黨有關之本國人的行動，政府本來就不予承認，對彼等行動將漸採相當之取締方針。前天二十號，總理大臣已有旨訓令都督，貴官可與都督商量對這些本國人訓戒和穩當的取締方法⁽¹⁶⁵⁾。

同時，日本參謀本部也急電川島，促其速行歸國。當川島接到參謀次長福田安正的電報，以爲計畫得到陸軍方面的有力援助，意氣奮揚地兼程趕回日本。不料福田一見面便告訴他有關內閣會議的決定，要他斷然停止滿蒙獨立運動。川島大爲激憤，立刻去謁訪外相內田康哉，極力爭辯，但內田最後表示：「這是閣議所決定，君等如果違反命令不明是非的話，那只有行使官方權力加以制裁。」川島無可奈何，轉而提出兩項條件：其一、永遠保障肅親王善耆在旅順的生活；其二、川島一夥人得保持現狀，照舊配置於滿蒙各地，不加干涉。內田均予同意，滿洲獨立問題乃告一段落⁽¹⁶⁶⁾。

可是內蒙古方面，却仍依原訂計畫着着進行。民國元年一月二十九日，川島浪速曾與喀喇沁王在北京簽訂協定，其內容如下：

- (一)內蒙古聯合組成一個強固的團體，以保障蒙古利益，及援護大清皇位的存立爲目的。
- (二)成立的團體須是統一內蒙古全部的機關，掌理一切文武要政。
- (三)川島同意喀喇沁王爲該機關的首腦，竭盡所能，以期成功。
- (四)爲達成此目的，先在喀喇沁王族內整頓優勢的兵力，然後漸次與各王公會合，組織團體。
- (五)川島爲創辦此事所需的武器、軍費及必要的日本人員，俱當經相當的契約，擔任計畫。
- (六)喀喇沁王以川島爲總顧問，參劃商量一切文武事宜。
- (七)所用要員俱一任川島監督，服從喀喇沁王的命令節制。
- (八)內蒙古團體成立後，倘受他國侵略，難以自衛時，須首先請求日本援護。
- (九)內蒙古團體須與日本保持特別良好之友誼，以維持大局，並務須對於日本人實業上的計畫加以援護，以期兩利。

(164) 轉引自栗原健：對滿蒙政策史之一面，頁142~143。

(165) 同上，頁143。

(166) 葛生能久：東亞先覺志士記傳（東京，黑龍會，一九三五年），中冊，頁346~348。川島浪速：肅親王，頁46~47。

(H)內蒙古團體對於俄國的外交事件，務須和日本秘密協商處理，不得未經協商便擅自重新訂定條約⁽¹⁶⁷⁾。

二月二日，川島、高山公通離開北京，松井清助大尉、多賀宗之少佐、木村直人大尉即共同與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、巴林王札噶爾密商推展此事，並擬訂進行計畫。至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兵變發生，遂由松井伴同喀喇沁王、木村伴同巴林王，乘亂先後潛離北京，前往蒙古，川島門下青年村井修亦秉承川島之意追隨喀喇沁王入蒙。多賀則赴東北負責調送武器彈藥。五月下旬，多賀在長春南方的公主嶺附近積屯了大批武器彈藥，準備運往內蒙，松井也率人自內蒙來會合。五月二十九日，由松井率領的輸送隊，以四十七輛大車載運這批武器彈藥，自公主嶺北方的朝陽堡出發，隨行護送的尚有以日人薄益三為首的滿蒙獨立義勇軍，及著名馬賊頭目左憲章的部眾，於六月一日行抵內蒙境內，遂高樹「大蒙古勤王軍」的旗號，繼續向目的地前進。然此事已為奉天都督趙爾巽探知，急命駐軍於鄭家屯的統領吳俊陞加以阻截。因此，輸送隊沿途與吳俊陞部發生多次激戰，結果松井方面有十三名日本人、九名蒙古人、三十名中國人戰死，松井本人則受重傷，與薄益三等一同被俘。經滯留在奉天的多賀向日本駐長春領事館告急求助，迭行交涉，松井、薄益三等人乃於六月底獲釋，返抵長春⁽¹⁶⁸⁾。

由於「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」的失敗，善耆一時停止活動，定居旅順，但內心始終念念不忘復辟，常訓誡其家人說：

宗社既亡，未來命運難卜，而如今家人得共聚一堂，未見離散，得全性命，深值慶幸。……。昔日漢光武滹沱河匿麥，燕婁亭飲豆粥，卒能興復漢室完成大業，望爾等各守其分，勿辭勞苦⁽¹⁶⁹⁾。

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善耆又與川島簽訂誓約書，原文如下：

和碩肅親王現因希望復興大清宗社，滿蒙獨立，並謀日清兩國特別之睦誼，增進兩國福利，維持東亞大局，貢獻世界和平為宗旨，因力不足，伏願大日本國政府之贊成援助，以期大成。為此豫先以左開條件，向大日本國政府為信誓，以後清國權利所至之處，即大日本權利所至之處也。

第一條：南滿鐵路、安奉鐵路、撫順煤礦、關東州、旅順、大連一帶日本所得權利等件，以後展為長期以至永久。

第二條：吉長鐵路、榆奉鐵路、吉會鐵路，其他將來於滿蒙布設一切鐵路，均俟獨立之復興，大日本政府協商可從其如何辦法。

(167)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，中冊，頁326~328。

(168) 同上，頁329~344。

(169) 石川安次郎：肅親王，頁156。

第三條：鴨綠江森林，其他森林、漁業、開墾、牧畜、鹽務、礦山等之事業均協商以爲兩國合辦。

第四條：於滿蒙地方，應允日本人之雜居事宜及一切起業。

第五條：外交、財政、軍事、警察、交通及其他一切行政，皆求大日本國之指導。

第六條：以上所訂之外，如大日本國政府有如協商之件，統求指示，定當竭誠辦理。

以上各項誓盟，以爲後日信守之據⁽¹⁷⁰⁾。

爲了達成復辟心願，善耆不惜把東北的鐵路、礦產，以及外交、軍事、行政諸權完全讓給日本。待袁世凱稱帝以後，善耆等人在日本的支持下，乃又有所謂「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」的出現。

三、遜清遺老

遺老一詞，最初見於史記；太史公樊鄴滕灌列傳贊曰：「吾適豐沛，問其遺老。」⁽¹⁷¹⁾可知遺老的原義是指更歷世事，碩果僅存的野老而言；歐陽修豐樂亭記：「百年之間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，欲問其事，而遺老盡矣！」⁽¹⁷²⁾文中的遺老，亦爲野老。野老而外，遺老一詞也被人推衍，用來稱呼舊臣；漢書劉向傳：「身爲宗室遺老，歷事三主」⁽¹⁷³⁾，是指先帝舊臣而言；晉書徐廣傳：「君爲宋朝佐命，吾乃晉室遺老」⁽¹⁷⁴⁾，則是指勝朝舊臣而言。

因此，清廷遜位後，一批前清舊臣遂以遺老自況。這批遺老是復辟派的骨幹分子中人數最多的一部分，包括以前曾任清朝中央政府的太傅、大學士、尚書、部臣、大學堂監督、翰林院編修、地方政府的總督、巡撫、布政使、提學使，乃至一般的幕僚、部屬等等。他們大多數是進士出身，因此除官僚職務以外，還具有「文人學士」的身份，他們所受封建文化薰染最深，又是封建文化的衛道者和直接傳播者，因此在社會上的影響較滿蒙王公貴族爲主的宗社黨爲大，活動範圍也更廣泛。

如果再進一步去分析這批遺老的政治歷史狀況，就可以看出：其中一些人是堅決的守舊分子，如勞乃宣、胡思敬、劉廷琛等，曾經反對過洋務、變法、新政、立憲；另外

(170) 會田勉：川島浪速翁，轉引自彭澤周：「辛亥革命與日本西園寺內閣」，中國現代史叢刊，第六冊，頁32～33。彭氏認爲所引誓約書原文，文詞略有日文口調，是否出自善耆之手，尙有疑問，或是由日人草成，再叫善耆簽認的。

(171) 司馬遷：史記（清乾隆四年校刊本，臺北，藝文，民四十四年），卷九十五，列傳第三十五，頁16。

(172) 歐陽修：歐陽文忠公集（四部叢刊正續，臺北，商務，民六十八年），卷三十九，頁13～14。

(173) 班固：漢書（百衲本二十四史，臺北，商務，民五十六年），卷三十六，列傳，卷六，頁26。

(174) 房玄齡等撰：晉書（百衲本二十四史，臺北，商務），卷八十二，列傳第五十二，頁13。

一些人則是原來的帝黨分子，如沈曾植、陳三立、鄭孝胥等，曾經一度贊助維新，具有微弱的進步傾向，但是在激烈的革命風潮激盪下，終於走向退化的道路，淪為純粹的保守派。這兩種人原來曾經長期互相責難、攻訐，民國以後，却由於反對共和、陰謀復辟的共同目標而結合起來了⁽¹⁷⁵⁾。

(一) 遺老念清情結的探討

所謂遜清遺老，絕大多數是漢人，僅有極少數的漢軍旗人。民國初年，他們都深抱亡國之痛，散居於全國各地，包括上海、青島、天津、徐州、兗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南昌、蘇州、廣州等通都大邑⁽¹⁷⁶⁾。悲憤的程度不下於喪失「祖業」的滿州人，對於清朝眷懷繫念，無以復加。

他們這種念清情結的形成，可以分別從政治和思想的背景上去作進一步的探討。

其一、就政治的背景而論，清朝是一個征朝王朝，在入關之初，曾遭到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，清廷為鞏固它統治者的地位，遂採行高壓（如屠殺、興文字獄）、懷柔（如誘以高官厚祿、開放科舉）並用的手段；於是，漢族士民的種族意識日漸薄弱消沉，而祇能在下層秘密會社中留存發展。雖然在滿清王朝體制的支配下，漢人多少仍受岐視，但是漢人知識分子也自有相當的機會，如經由科舉、祖先恩蔭、捐納制度等途徑成為統治階層，進而以官僚的形式獲得與滿人同等甚至超越滿人的權力和財富。因此，漢人統治階層與滿洲王朝在利害上已構成一體的關係，而有維護滿洲王朝的傾向。故當清帝退位後，那些被迫喪失權位財富的舊日漢人統治階層，都積怨於民國，以遺老自況，他們從事復辟的動機，也多少含有重新攫回權力、財富的意味在內。

其二、就思想的背景而論，清朝雖以異族入主中原，但是它漢化最深，幾乎完全承襲了中國的傳統思想，尤其是對於儒學尊崇的態度，更普遍地博得漢族士人學者的好感。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西學大量湧入中國，曾遭致清朝絕大多數士大夫的堅決詆毀，這批人多勢眾的士大夫，站在思想本位主義的立場，視西學如寇讎，表示了無與倫比的衛道精神。所以，在遜清遺老眼中，辛亥變起，民國建立，不單是一項政權上的轉移，更是傳統儒教思想淪亡的象徵，他們在痛心疾首之餘，眷懷清朝的意念，自然是更加深刻。同時他們也深受傳統忠君觀念（清朝各帝都刻意提倡此一觀念）的影響，紛紛以南宋遺民和明末遺老的言行事跡為準則，從事包括復辟在內的各項活動。

(二) 遺老活動的方式

遺老對清朝的追念活動，可以歸納為消極性的和積極性的兩大類。消極性的活動，

(175) 參見章開沅、劉望齡：「論張勳復辟的歷史機緣和失敗的必然性」，新建設，六十五卷三期，頁32。

(176) 劉望齡：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，頁64。

通常有如下幾種方式：

其一、是詩酒唱和：民國以後，遺老泰半避居租界，心境既同，於是發起文社，定期雅集，以詩酒排遣時日，並藉此發抒他們對於清朝的衷心懷念。文學家胡懷琛曾經根據時代的不同，把中國的文社分成三類，一個是治世（或盛世）的文社，一個是亂世（衰世）的文社，一個是亡國遺民的文社。所謂亡國遺民的文社，則又和前兩類不同。國已滅亡，挽救無及，而前朝的遺民却不願做新朝的順民，反抗固然無力，而言論也不能自由，於是他們以文字從消極的方面以發其牢騷，首陽「薇蕨之歌」，西都「禾黍之什」，都是這一類的亡國遺民之詩。他們有三、五個同志，組成有形式的集團，就是亡國遺民的文社。這一類的文社，可以宋末元初吳渭發起的「月泉吟社」為代表；至於遜清遺民的文社，在他們自己認為屬於第三類，然而他們的時代究竟和宋明遺民不同，實際上倒有些和第一類的文社相似，變成有閒階級者消遣光陰的玩意⁽¹⁷⁷⁾。

在遜清遺老發起的文社中，以上海「淞社」規模最大，係由劉承幹（翰怡）、周慶雲（夢坡）主持社事，成立於民國二年。先後入社的遺老有李瑞清（梅盦）、繆荃孫（藝風）、李岳瑞（孟符）、吳慶坻（子修）、徐珂（仲可）、陶葆廉（拙存）、章梈（一山）、王國維（靜安）、胡韞玉（樸安）、喻長霖（志韶）、唐宴（元素）、張爾田（孟劬）、潘飛聲（蘭史）、姚文棟（東木）、許澁祥（子頌）、李詳（審言）、鄭文焯（叔問）等數十人⁽¹⁷⁸⁾，均為一時名士。其中李瑞清，曾任江蘇提學使，署理江南布政使，民國以後，移居上海，態度消極，改著道士裝束，自號清道人，鬻書為生⁽¹⁷⁹⁾，是遺老中最堅貞不貳的人物，孫玉聲的「清道人軼事」記稱：

惟是先生手書之件，凡清社未屋之前，其署款，必皆為名。若民國年間所書，則下款必僅清道人三字，且不書民國年月。有輦重金強之者，則繕光緒或宣統某年，而下款乃署名李瑞清，否則，縱萬全不能易其操，其性情之堅執，殊足以覘其風骨之端嚴，誠清室遺臣中有數人物也⁽¹⁸⁰⁾。

除淞社以外，上海尚有高翀發起的「希社」，參加的有周慶雲、姚文棟、潘飛聲、鄭弢（翰飛），以豫園壽暉堂為社集，月凡一舉，為文酒之會⁽¹⁸¹⁾。沈曾植也發起「超社」和「逸社」⁽¹⁸²⁾；參加的有馮煦、樊增祥、陳夔龍、梁鼎芬、吳慶坻等⁽¹⁸³⁾。鄭孝

(177) 胡懷琛：「中國文社的性質」，越風半月刊，二十三、二十四期合刊，頁7~8。

(178) 周延祚編：吳興周夢坡（慶雲）先生年譜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），頁21。

(179) 李瑞清：「鬻書後引」，清道人遺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八年），佚稿，頁15。

(180) 孫玉聲：退醒廬筆記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），下卷，頁3。

(181) 同註（178）。

(182) 王蘊常：「嘉興沈寐叟先生年譜初稿」，東方雜誌，三十六卷十六號（民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），頁65~66。

(183) 姚詒慶：「清故湖南提學使吳府君墓誌銘」，見閔爾昌編：碑傳集補（四部善本叢書館印行），卷二十，頁20。

胥則有「一元會」的設置，參加的有王乃微（聘三）、朱祖謀（古微）、唐宴（元素）、楊鍾羲（子勤）、章梲（一山）等⁽¹⁸⁴⁾。遺老們在上海流連詩酒的結果，倒是產生了不少作品，使上海學藝界出現了所謂「遺老文學」⁽¹⁸⁵⁾，一時稱盛。天津方面則有陳寶琛等人設立的「須社」⁽¹⁸⁶⁾。

此外，遺老還有許多不定期，不具文社組織形式的聚會飲宴。如民國元年六月一日（壬子年四月十六日），陳三立（伯嚴）、李瑞清、梁鼎芬（節庵）、麥孟華（蛻庵）、樊增祥（雲門）、楊鍾羲、沈曾植（子培）、鄭孝胥（蘇龕）、陳曾壽（仁先）、吳慶坻、李岳瑞、沈瑜慶（愛蒼）、林開暮（書貽）、胡思敬等二十七人聚晤於上海愚園，相對唏噓，感懷不已⁽¹⁸⁷⁾。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四日（壬子年十二月十八日），王闓運、樊增祥、陳三立、李瑞清（梅癡）、瞿鴻禨（子玖）、沈曾植、吳慶坻等九人集飲於上海⁽¹⁸⁸⁾。民國三年（甲寅年），周馥（玉山）、趙爾巽（次珊）、張人駿（安圃）、陸潤庠（鳳石）、勞乃宣（玉初）等十人，相約爲十老，於同年三月二十五日（陰曆二月乙巳）會飲於青島周氏齋中，並各賦一詩以紀之⁽¹⁸⁹⁾。

其二、是拜謁崇陵：崇陵是清德宗的陵墓，在直隸易州（河北省易縣）境內。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（一九〇九年一月五日），清廷擇定西陵的金龍峪爲崇陵所在地，派載洵、溥倫、載澤、鹿傳霖負責承修，並命慶親王奕劻會同辦理一切事宜⁽¹⁹⁰⁾，於宣統元年二月初八日（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七日）動工營建⁽¹⁹¹⁾，德宗靈櫬則暫時安放於西陵的梁格莊。至辛亥革命爆發，崇陵工程因中輟，後經梁鼎芬多方奔走呼號，遂復於民國二年春天開工。梁鼎芬（一八五九～一九一九）字星海，號節庵，廣東番禺人，清末曾主講武昌兩湖書院，歷任漢陽知府、湖北按察使等職。當武昌起義黎元洪被推爲湖北都督以後，梁曾電勸黎回歸清朝，並保證清廷不究既往，爲取信於黎，黎甘願交出其唯一的兒子綵勝爲人質⁽¹⁹²⁾，事雖未成，梁的耿耿忠悃，也可概見。清帝退位後，梁又馳往梁格莊行宮，號哭於德宗靈櫬之前⁽¹⁹³⁾。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清隆裕太后病

(184) 鄭孝胥：「丙丁日記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64。

(185) 胡懷琛：「上海學藝概要」，上海通志館期刊（香港，龍門影印本），一卷三期（民二十三年三月），頁1093。

(186) 陳曾壽：「聽水齋詞書前序」，載陳寶琛：滄趣樓詩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），附錄。

(187) 胡思敬：「吳中訪舊記」，退廬文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九年），卷二，頁9~10。

(188) 王闓運：湘綺樓日記（臺北，學生，民五十三年），民國元年壬子，頁35。

(189) 勞乃宣：桐鄉勞先生遺稿（臺北，藝文，民五十三年），卷三，頁8。及其軻叟自訂年譜（臺北，廣文，民六十年），頁22。

(190) 宣統政紀（臺北，華文，民五十三年），卷四，頁29。

(191) 宣統政紀，卷八，頁1。

(192) 楊敬安輯：梁節庵（鼎芬）先生腹稿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年），頁20。

(193) 富察敦崇：隆裕太后大事記（臺北，成文，民五十七年），頁139。

卒，各地遺老先後赴京致哀獻祭⁽¹⁹⁴⁾。至同年冬天，崇陵工程告竣，德宗及隆裕太后於十二月十三日安葬於崇陵，梁鼎芬即受命守陵種樹。遺老葉昌熾對梁所爲大加讚歎，譽梁爲「今之烈士，亦奇士也。」⁽¹⁹⁵⁾甘鵬雲則撰有「梁文忠公逸事」，記述梁守陵種樹的情形：

是年十一月十六日（按：此爲陰曆），兩宮奉安崇陵，公拜崇陵種樹事宜之命，自是守陵種樹，久旅梁格莊，榜所居曰種樹廬，藟衣蔬食，履穿踵決，不顧也。乙卯（按：即民國四年）二月十一日清晨，公上崇陵，荷鍤趨隆恩右門及寶城前，破土五處，自破土日起，迄六月，隆恩殿前種白果松三十四株，寶城前種羅漢松一十八株，翠柏二株，寶城兩旁種白果松五十二株，寶城後種羅漢松三株，都一百九株，皆親種者，其餘皆督率工役種之。丙辰（按：即民國五年）八月初六，種樹事宜完竣，用西洋攝影法，拍崇陵種樹圖，以誌不忘。公忠義大節，漬漬人口，此其一也⁽¹⁹⁶⁾。

德宗及隆裕太后安葬於崇陵後，各地遺老紛紛前往拜祭，其中前清舉人林紓（字琴南，號畏廬），不辭千里，先後凡「十謁崇陵，肅衣冠望祭於關門之外。」⁽¹⁹⁷⁾林紓也自述在拜謁崇陵時，「雖大雪彌天，而衰老之年，仍跪起丹墀之下，不敢忘敬，豈此報恩，亦自盡犬馬戀主之心而已」⁽¹⁹⁸⁾，遺老眷念故君舊朝的心理，表露無遺。

其三、是提倡尊孔：清廷的遜政，民國的建立，在遺老眼中，也就是儒教的式微淪亡，如章梲認爲「自光緒庚子而後，國人羣忱於外患之乘，而奮然變計，內閥益劇，遂成宣統辛亥之大變，縉紳儒族咸入異流，禮教法物一切蕩然，積憤之士輒謂國非其國，人類盡矣。」⁽¹⁹⁹⁾楊圻（雲史）也感慨「國變以來，士子謏陋不學，益以邪說，遂無父子男女之倫，今且爭議不讀經，廢孔祀矣，悠悠滄海，我其濟乎？」⁽²⁰⁰⁾因此，民國以後遺老紛紛參與尊孔活動。據沈曾植說：「吾黨尊孔本意，在求萬民之治安，非僅一姓之興廢。」⁽²⁰¹⁾足見部分遺老提倡尊孔是兼有復辟意圖的。他們利用尊孔、讀經、辦報、創辦文教機構等活動，大力宣傳三綱五常，爲復辟製造理論根據⁽²⁰²⁾。所以「復辟需要尊

(194) 前往致祭的遺老姓名，見隆裕太后大事記。

(195) 葉昌熾：緣督廬日記（臺北，學生，民五十三年），記十五，頁27。

(196) 甘鵬雲：潛廬續稿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二年），卷十，頁13。

(197) 鍾廣生：「書林畏廬先生軼事」，慈龕文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六年），卷二，頁9。

(198) 林紓：「上陳太保書」，畏廬三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二年），頁32。

(199) 章梲：一山文存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八年），卷九，頁14。

(200) 楊圻：「癸丑北遊詩五十首」即註，江山萬里樓詩鈔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六年），頁224。

(201) 沈曾植：「致陳重遠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87。

(202) 同註(175)，頁33。

孔，尊孔爲了復辟」(203)。二者關係密切。如謂民初的尊孔問題是「政治復辟陰謀的前哨戰」(204)，也不爲過。

民國二年，「孔社」成立於北京，社長爲徐瑛，副社長饒石頑，社員有趙維熙、王樹枏、惲毓鼎及其他知名之士一百數十名。王錫蕃也在北京網羅學者文人組織「孔道會」，會長爲康有爲，副會長王錫蕃，會員有梁啓超、熊希齡、宋育仁等二百餘名(205)。同年大成節，陳煥章等人創開全國孔教大會於山東曲阜(206)，盛況空前。德人衛禮賢(Richard Wilhelm)則於民國二年，協同寓居青島的遺老創設「尊孔文社」，特請有志復辟的勞乃宣前往主持社事(207)。同年，鄭孝胥在上海與遺老名士組織讀經會(208)。其時，上海遺老頗與美國傳教士李佳白(Gilbert Reid)交往，講論經義。李曾於清末贊助中國維新，與呂海寰等設立「尚賢堂」(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)(209)。「以期培養人才，裨益全局。」(210)民國二年春，王闓運便應李的邀約，赴上海尚賢堂爲思賢會演說(211)，民國三年李在上海公開講演復辟(212)，則其居心可知。

其四、是纂史修志：部分遺老基於「國可滅，史不可滅」的心理，先後從事纂史修志的工作。最令人矚目的是民國三年三月九日，袁世凱下令設置清史館，準備「延聘通儒，分任編纂」，修成專書，「用以昭示來茲，導揚盛美。」(213)，並任趙爾巽爲清史館總裁。一時遺老如于式枚、吳士鑑、繆荃孫、陶葆廉、李岳瑞等數十人，先後應聘入館工作(214)。他們「多以元遺山自況，用修史以報故君。」(215)，因此對清廷多事迴護。民國十六年底，清史稿印就發行，翌年六月，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，故宮博物院奉命接收清史館，將尚未發行的清史稿，暫行封存，另聘史學家嚴加省查。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根據省查結果而呈文行政院，舉出該書「反革命」、「藐視先烈」、「不奉民國正朔」、「列書僞諡」、「稱揚遺老、鼓勵復辟」、「反對漢族」、「爲滿清諱

(203) 章開沅：「孔家店與張勳復辟」，*文物*，一九七四年第五期，頁45。

(204) 陳旭麓：「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—民國初年的反動復辟思想」(一)，*學術月刊*，一九五九年第三期，頁70。

(205) 「尊孔問題」，*支那*，六卷一號，頁68。

(206) 陳煥章：「曲阜孔教會會長孔厚庵先生碑文」，*續修曲阜縣志*（臺北，成文，民五十七年影印），卷八，藝文志，頁53。

(207) 勞乃宣：*勅叟自訂年譜*，頁22。

(208) 葉參、陳邦直等編：*鄭孝胥傳*（滿日文化協會，一九三八年），頁28。

(209) 胡光煦：「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」(四)，*傳記文學*，三十六卷一期，頁118。

(210) 李佳白：「尚賢堂文錄」，*萬國公報*（臺北、華文，民五十年影印本），卷九（一八九七年），第一〇二期，頁3。尚賢堂章程，則載同卷第一〇一期，頁17~18。

(211) 王闓運：*湘綺樓日記*，民國二年壬子，頁37~38。

(212) 郭廷以：*近代中國史綱*，頁439。楊幼炯：*中國政治思想史*（臺北，商務，民五十三年），頁243。

(213) *政府公報*（臺北，文海影印，民六十年），民國三年三月十日，命令。

(214) 參見金梁：「清史稿校刻記」，*瓜圃叢刊續錄*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七年），頁21~23。

(215) 孟森：「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」，*國記北京大學國學季刊*，三卷四號，頁691。

飾」、「體例不合」等十九項大謬⁽²¹⁶⁾。由於立場不同，呈文所舉各項未必盡能持平，然遺老寓情於史的若心，已無庸置疑。

私人撰史方面，如黎澹枝、溫肅等，以私人財力纂成德宗景皇帝聖訓，於民國二年十二月七日進呈稿本，而得遜帝溥儀的獎賞⁽²¹⁷⁾。吳慶坻則著有「辛亥殉難記」⁽²¹⁸⁾，羅正鈞有「辛亥殉節錄」⁽²¹⁹⁾，馮恕有「庚子辛亥忠烈像贊」⁽²²⁰⁾，以表彰武昌起義後為清朝殉難的文武官員。至李詳(審言)擬仿晉永嘉流人之例，撰「海上流人錄」替諸遺老作小傳，則跡近標榜⁽²²¹⁾。此外，遺老也紛紛參與各省修志的工作。如民國四年浙江當局議修浙江通志，由著名遺老沈曾植擔任總纂，主持其事，先後聘朱祖謀、吳慶坻、陶葆廉、章梲、葉爾愷、朱福清、金蓉鏡、劉承幹、王國維、張爾田等人為分纂，喻長霖為提調。定續老凡例，乾隆元年迄宣統三年，議增遺民傳、大事記、大事錄，皆補前志所遺⁽²²²⁾。同年廣東開局修志，廣東遺老何藻翔，溫肅等人都應聘入局工作。

遺老積極性的活動，約有兩種方式：

其一、是奔走聯絡，進行復辟：如民國元年六、七月間，廣東遺老溫肅(毅夫)前往瀋陽，勸東三省都督(七月十七日改東三省都督為奉天都督，不兼轄吉林、黑龍江)趙爾巽(係前清東三省總督)起兵匡復清朝未果，旋南下與寓居青島的恭親王溥偉及遺老會晤。民國二年二月，溫又自粵北上活動，密謀舉事，據溫肅記其經過說：

癸丑(民國二年)二月，赴青島，轉赴兗州訪張紹軒(張勳)於軍次。時王鈺山(王寶田)在張幕府，因王介見張，述近日宮中事，談及時局，引為同志。復返青島，恭邸(恭親王)與張紹帥密謀討賊，期以三月一日舉義，旋改初三襲濟南，事為賊將偵悉，斷兗濟鐵路車軌。紹帥急彌縫滅跡，幸檄文告示皆王領銜，紹帥未蓋印，遂諉於王，其檄示實晦若、幼雲、詒重與余四人主之⁽²²³⁾。

溫文中的晦若、幼雲、即是寓居青島的著名遺老于式枚及劉廷琛，除于、劉以外，趙爾巽、周馥、陸潤庠、勞乃宣、辜鴻銘等人都是青島遺老的重要分子，因恭親王溥偉亦旅

(216) 何烈：「六十年來之清史稿與清史」，程發軔主編：《六十年來之國學》(臺北，正中，民六十三年)，頁468～470。

(217) 溫肅：《欽庵奏稿》(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)，頁36，及《溫文節公年譜》(與《欽庵奏稿》合為一冊)，頁5。

(218) 吳自修(慶坻)著《辛亥殉難記》，五卷，係民國五年排印本，共列舉辛亥死難之清朝文武官員一百五十餘位，民國十二年重新刊印，又有增補。

(219) 《辛亥殉節錄》，計六卷二冊，係民國九年湘潭羅氏義正齋刊本。

(220) 《庚子辛亥忠烈像贊》，一冊，係民國間影印本。

(221) 葉昌熾：《緣督廬日記》，記十五，頁11～12。尹炎武：「朱(孔彰)李(詳)二先生傳」，《碑傳集補》，卷五十三，頁17。

(222) 同註(182)，頁66。

(223) 溫肅：《溫文節公年譜》，頁5。

居青島，遂以溥偉馬首是瞻。上海方面的著名遺老，則有瞿鴻禨、陳夔龍、沈曾植、陳三立、李瑞清、馮煦、俞廉三、余誠格、樊增祥、左孝同、袁樹勛、劉承幹、章梠、秦炳直等，其中瞿鴻禨曾任軍機大臣，位最高，儼然是上海遺老的領袖，沈曾植、李瑞清則為中堅人物。青島、上海兩地遺老，雖然交往甚密，對於復辟的見解却未必完全一致，據劉成禺記稱：

在袁世凱謀稱帝時，日人曾派重要人物多次往來協商於青島、上海間，欲推宣統復辟，或在東三省建立「大清國」，恭王、肅王移住旅順，即商訂此協議也。青島方面一致贊同，日人乃偕青島遺臣要人，來滬方取同意。瞿子久（瞿鴻禨）首先反對，堅持瞿意者，則李梅菴（李瑞清）、沈子培（沈曾植）、陳散原（陳三立）諸人，梅菴謂是置宣統於積薪上也。青島、上海意見既分，袁世凱多羅致青島重臣入京矣⁽²²⁴⁾。

又如遺老朱江，字岷源，係明朝後裔，廣州駐防漢軍旗人，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中舉，官至內閣中書。清廷遜政後，痛不欲生，與國雄（字孟賢，前清外務部小京官）二人奔走於恭親王溥偉和升允之間，密謀匡復清朝。曾遠至青海西寧謁訪升允，旋又間關萬里，不辭辛勞，將升允覆函送交溥偉。民國二年春，朱江返回北京，仍與升允信息往還，踪跡漸露。同年夏，升允在庫倫舉事，傳檄內地，以抗民國。民國政府派員四處搜查，朱江携家小避往趙州，終為邏者偵悉，逮送京師軍政執法處，訊明處決⁽²²⁵⁾。

其二、是著書撰文，鼓吹復辟：清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冬天，革命軍大起，議行共和，勞乃宣見狀，遂撰「共和正解」一文，謂共和一詞，源自西周，史記周本紀「厲王出奔於彘，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」共和十四年，厲王死於彘，周公、召公乃共立太子靜為王，是為宣王。所以共和的本義為君幼不能行政，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，伊尹之於太甲，霍光之於漢昭帝，皆屬此類，故共和實為君主政體，而非民主政體。今天下競言共和，如依共和本義解釋，目前清廷所頒布的君主立憲政體，正與西周的共和相符，係真共和，是為共和的正解。至時人所謂的共和，乃是民主，而非共和，是為共和的謬解。勞氏認為民主之制，源自西方，不能切合中國國情，一旦實行，必致大亂。故呼籲今日倡言共和者，應「恪守正解，以維君統，而奠民生，勿為謬解所誤，致蹈無君之愆，而貽民生之戚。」⁽²²⁶⁾是勞有意曲解共和，混淆視聽，想藉以消弭革命，保全清朝，用心至為良苦。

(224) 劉成禺：《世載堂雜憶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年），頁136。

(225) 溫肅：「為故內閣中書朱江等請卹疏」，壁庵奏稿，頁37。陳毅：「朱江墓志銘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96~97。

(226) 勞乃宣：《桐鄉勞先生遺稿》，卷一，頁34~36。

民國三年六月，勞又撰「續共和正解」，謂清廷遜位前後，袁世凱所以與革命黨妥協，實為情勢所迫。然袁自任民國大總統以來，對清室尊禮迴護，與日俱增，特限於約法，不能昌言復辟。且「幼主」尚在沖齡，不能親理萬機，也無由奉還大政，故不得不依違觀望，以等待時機。因此勞氏認為民國總統任期訂為五年，可以連任一次，而今年為共和三年，至總統十年任滿（按：袁世凱係民國二年任正式大總統），為共和十二年，其時宣統皇帝已十八歲，可以親裁大政，即依西周共和十四年周、召還政於宣王故事，還政於宣統⁽²²⁷⁾。勞並請趙爾巽將「正續共和正解」携至北京，代呈袁世凱，同時也致函徐世昌（時任國務卿）等人，請其轉達；又將「正續共和正解」刊行於世，一時輿論大譁，遺老紛紛乘勢活務，劉廷琛的「復禮制館書」，宋育仁的「還政清室」演說，傳遍北京⁽²²⁸⁾，以致復辟謠言四起，鬧得滿城風雨，人心惶然。

劉廷琛的「復禮制館書」，約撰於民國三年八月下旬⁽²²⁹⁾，起因是同年七月一日，政事堂設禮制館，國務卿（政事堂首長）擬聘前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、學部副大臣劉廷琛為禮制館顧問，劉書辭不就，書中並醜詆民國所行共和政治，謂「沉觀三載，灼見病源實在於此。蓄之久而不敢輕發，懼不知言者將誣以反對之罪。」⁽²³⁰⁾又謂「夫民主國與中國國情不適，已為衆人所信。然袁（世凱）公誤自稱帝，有悖初意，亦必為中國學國所不服。為今之計，惟返大政於大清皇室，復還內閣總理之任。」⁽²³¹⁾劉更慨然表示：「如謂淆亂國是，聲其罪以暴天下，亦所不辭。」⁽²³²⁾態度極為頑強，然劉為著名遺老，此等言論，實不足為奇。

至於宋育仁，一向未以遺老自居，竟然公開倡議復辟，頗令一般人震驚。宋字芸子，一字芸岩，四川富順人，清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進士，早年任職駐英、法、義、比公使館參贊，歸國後將所著「采風記」、「時務論」凡數萬言上呈德宗，力主變法自強；其後回四川辦商礦事宜，清末歷任湖北候補道、江南南菁學堂監督兼總教習、江西銅元局總辦、禮學館纂修、京師大學堂教授等職。民國初年，宋歸隱茅山，欲興農墾。民國三年四月，其師王闓運至京任國史館館長，作函招宋，宋遂入都任職國史館協修。宋嗜好飲酒，而又賦性鯁直，每值公餘，輒喜聚衆縱談時事⁽²³³⁾。至同年冬天，北

(227) 桐鄉勞先生遺稿，卷一，頁37~40。

(228) 袁世凱竊國記（臺北，中華，民五十六年），頁197。

(229) 郭廷以謂撰於民國三年八月三十一日，見中華民國史事日誌，第一冊，頁157。

(230) 轉引自秋桐（章士釗）：「復辟平議」，甲寅雜誌，一卷五號，頁4。

(231) 轉見陳旭麓：「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—民國初年的反動復辟思想」(二)，學術月刊，一九五九年第四期，頁75。

(232) 同註(230)。

(233) 參閱蕭月高：「宋芸子先生傳」，國史館館刊，一卷二期（民三十七年三月），頁108~109。及「宋育仁之事歷」，支那，五卷二十四號，頁46~48。

京復辟謠言大起，遂有十一月十三日肅政使夏壽康等呈請嚴行查禁改變國體、還政清室的論說，並轉知清室內務府，遇事留意，杜莠絕嫌，用副民國優禮清室的至意。奉批已悉交內務部查辦⁽²³⁴⁾。十一月十七日，宋突以復辟嫌疑被步軍統領衙門拘傳⁽²³⁵⁾。王闓運在宋被捕翌日的日記中謂：「宋芸子一夜未還，云已被捕，皆言前半月已有風聲，云係宗社黨。」又謂：「夜間警察兵來搜宋行李，譚芝公皇皇，如臨大敵。」⁽²³⁶⁾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民國政府申令嚴禁倡為歸政清室之說⁽²³⁷⁾，對於復辟打擊至大。北京名記者黃遠庸在該日的報導中指出：

大抵復辟邪說，惟勞乃宣正續共和解一書為之厲階，京中除暫捕宋育仁一人外，並無何等羅織，亦無其他變故，今內務部已有明令禁令，司法部亦飭檢查廳嚴行偵緝，則此等無根據無價值之談，自必煙消火滅，響絕聲沈，初不必赫赫然以為大事也⁽²³⁸⁾。

宋育仁被捕後，經步軍統領衙門審問，並由京師警察廳派警官赴其寓所檢查，起出信函文字，間有疑竇，又其在步軍統領衙門呈遞的親供意見書，也多有「悖謬」之語，內務部以宋「附和邪說，紊亂國憲」，本應嚴予處罰，但念其「年老荒悖，精神奮亂，且無着手實據」，因此呈請將宋遞回四川原籍，交由地方官妥為安置，並隨時察看⁽²³⁹⁾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袁總統批准內務部所請，且令該部轉飭四川暨沿途地方長官，遵照辦理⁽²⁴⁰⁾。歷時一個多月的復辟風潮，遂告平息。

對於這次復辟風潮的肇端，也就是勞乃宣刊印「正續共和正解」一事，史學家陳訓慈有較為公正的批評：

自滿清之亡，漢大臣退隱於野，猶多守帝制而奉舊號者，雖悖乎民國之制，然衡以忠節之義，要猶未可深責。惟如勞先生之著共和正解，至以伊（尹）、周（公）期項城（袁世凱），議君主民主，主還政於清室，立言奮亂，淆惑人心，宜為識者所詬病，不第以躬與復辟召尤已也⁽²⁴¹⁾。

此外，如就當時民國的環境而論，或有幾項因素和現象，頗能助長遺老復辟活動的進行：

其一、民國成立以後，政局一直不够穩定，軍人割據，黨爭激烈，正合遺老唯恐天

(234) 政府公報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，呈。

(235) 東方雜誌，十一卷六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24。

(236) 湘綺樓日記，民國三年甲寅，頁38。

(237) 政府公報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命令。

(238) 黃遠庸：遠生遺著，卷二，頁286。

(239) 東方雜誌，十二卷一號，中國大事記，頁4。

(240) 政府公報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命令。

(241) 陳訓慈：「桐鄉勞玉初先生小傳」，文瀾學報，第一集（浙江省立圖書館，民二十四年一月），頁361。

下不亂的心意，一般人民也對共和政治發生疑懼，均有助於復辟的進展。

其二、民國軍政要人，多係前清官僚脫化而來，不僅思想陳舊，且泰半係遺老故交舊屬，因此，當遺老奔走活動時，往往能得到他們的庇蔭或支持。

其三、中國社會一向重視出身資歷，並有尊重知識分子的傳統，遺老多為前清大吏或擁有科名的學者耆儒，因此，除了激烈的革命黨人以外，一般人對於遺老並無太大的惡感，甚至有的還對遺老相當優禮尊敬。

其四、遺老利用租界為庇護所和策動復辟的基地，使民國政府無法取締或逮捕他們。

其五、清廷固然已經退位，但是遜帝溥儀仍得暫居故宮，坐享民國所允諾的種種優待條件，暗中維持一個小朝廷的局面，並沿用宣統年號，年節照常封賞，這種情形，使遺老在精神上得到極大的鼓舞，對於辟復的前途懷著無限的憧憬和殷望。

不過，遺老集團也有幾個大的隱憂存在，足以削弱復辟活動的成效：

其一、是遺老年齡甚大（七十歲、六十歲以上的遺老，大有人在），在心態方面容易牽就、消極，缺少一股勇往無前的銳氣。

其二、遺老多半「窮乏憔悴」⁽²⁴²⁾，生計艱難，對活動所需經費，常有不勝負擔的困窘。

其三、遺老多半曾經是統治階層，對於重新獲致權力、地位的嚮往，自然是十分急切。所以，一旦機會來臨，一些遺老往往經不起誘惑，應聘出山，仕宦於民國，而放棄了原有的遺老身分，足見遺老集團缺乏強勁的向心力和穩固的基礎。

其四、遺老以復辟作號召，自難獲得多數漢人的響應。遺老因缺乏羣眾基礎，在聲勢上甚感孤立，祇有厚結統兵大員，利用民國政治紛爭的空隙，以政變的方式來達到復辟的目的，民國六年的張勳復辟事件，便是一個有力的例證。

其五、一般青年知識分子，受新思潮、新教育的影響，對於陳腐的復辟論調均無好感，甚至遺老的子孫輩，也未必贊成復辟，何況他們並不盡如他們的父祖一樣，直接承炙過清廷的恩賜，對清廷的感念程度，自然是比較淡疏。所以，復辟只是遺老及身而止的一種活動，隨着歲月的消逝，老成逐一凋零，後繼乏人，當是遺老集團最大的隱憂，胡思敬等人有鑑於此，曾提出留意培養人才、拔識後進的主張，雖然未見成效，却由此看出遺老中亦不無具有遠見的人士，只是這種人為數太少，又限於客觀環境，不能有所作為。

(242) 徐一士：「談陳夔龍」云：「民國成立以後，勝清舊臣，願比殷頑，以遺老自待者，窮乏憔悴者不少。」見一士類稿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五年），頁157。另劉聲木：蓀楚齋隨筆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七年），卷九，頁14亦謂：「避亂在滬之（清）遺臣遺民，經濟每多困難，平時出門，僅坐黃包車而已。時人集一聯云：革命鉅子綠氈帽，亡國大夫黃包車，甚工切。」

四、舊保皇會分子

(一) 保皇會的蛻變

「保皇會」西名 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，譯義即維新會⁽²⁴³⁾，發起人是康有爲。康有爲保皇思想的發軔，當在清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八月戊戌政變以後，德宗被幽禁於瀛臺，康則與梁啟超等人輾轉逃往日本，念念不忘德宗的困境及德宗對他的殊遇，他在日本公開表示：

今上（德宗）聖明，必有復辟之一日，余受恩深重，無論如何不能忘記，惟有鞠躬盡瘁，力謀起兵勤王，脫其禁錮瀛臺之厄，其他非余所知，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⁽²⁴⁴⁾。

由於康的保皇意念十分堅決，故儘管日人居間奔走協調，他始終不肯與在日本的革命黨孫中山先生等人合作，頗招致日人的不滿。

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二月，康在日本政府示意下離開日本，前往加拿大，遊說當地華僑。同年六月十三日（七月二十日），康正式創設保皇會會於加拿大的域多利（Victoria），康曾記此事經過：

己亥（按：即光緒二十五年）六月十三日，與義士李福基、馮秀石及子俊卿、徐爲經、駱月湖、劉康恒等創立保皇會。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華會館，率邦人祝聖壽，龍旗搖颺，觀者如雲，灣高華與二埠同日舉行，海外祝嘏，自此始也。⁽²⁴⁵⁾此後六、七年間，保皇會先後在美洲、南洋、澳洲、澳門、日本等地擴展會務，於一百六十餘埠建有組織，聲勢頗盛。單就美洲保皇會而言，至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已設有十二個總會，一百零三個支會，其分佈情形如下：

(一) 加拿大：以溫哥華爲總會，所屬有十二支會。

(二) 美國西北部：以砵崙（Portland）爲總會，所屬有二十六支會。

(三) 美國西部：以三藩市（即舊金山 San Francisco）爲總會，所屬有六支會。

(四) 美國東部：以紐約爲總會，所屬有六支會。

(五) 美國中部：以芝加哥爲總會，所屬有十三支會。

(六) 美國南部：以紐柯連（New Orleans）爲總會，所屬有四支會。

(七) 美國北部：以氣連拿（Helena）爲總會，所屬有十二支會。

(243) 伍憲子：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（舊金山，世界日報社），頁25。張玉法：清季的立憲團體，（台北，中研院近代史所專刊），頁228則謂保皇會亦稱「中國維新會」（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），其西名與伍書所述略有出入。

(244) 馮自由：革命逸史，初集（臺北，商務，民五十四年），頁73。

(245) 轉見丁文編：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（臺北，世界，民五十一年），頁88。

(八)墨西哥：以萊苑 (Torreon) 爲總會，所屬有九支會。

(九)中美洲：以巴拿馬 (Panama) 爲總會，所屬有四支會。

(十)南美洲：以秘魯之利馬 (Lima) 爲總會，所屬有三支會。

(十一)檀香山：以火魯奴奴 (即檀香山 Honolulu) 爲總會，所屬有八支會⁽²⁴⁶⁾。

由於保皇會的理論基礎原是建立於中國傳統的忠君觀念上，以尊皇、變法、救中國、救黃種人爲宗旨⁽²⁴⁷⁾，口號平實，頗易爲當時的華僑社會所接受，保皇會的組織能够遍於亞、美、澳三洲，與此不無關係。保皇會除本身的組織外，爲結合人才、宣傳主義、籌措經費，尚有許多兼營的事業，如學校、書局、報館、商業等。

然因分布太廣，兼營事業過多，份子駁雜，流品不齊，以致保皇會在組織方面未臻健全。其章程不一律，各自爲政，聯絡困難，而且中央機關的控制力也有所不逮。試觀保皇會總會長康有爲在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正月所發公函，謂「我會遍五洲，凡百餘埠，會員以萬計，不意數年之間，浩大如此。維會事頗嫌散漫，空言無補實行，若不求改良增進，是有會與無會同也。」⁽²⁴⁸⁾可證當時組織的鬆散。

至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七月，清廷迫於輿情，下詔預備立憲，康有爲爲順應國內蓬勃開展的立憲運動，特於是年九月四日（十月二十一日）以「今上不危，無待于保。」爲藉口，佈告更改會名，擇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元旦改保皇會爲「國民憲政會」，亦稱「國民憲政黨」，以講求憲法，促進憲政。佈告全文凡六千餘言，係康有爲所寫，由紐約發出。同時梁啓超自日本致函，則主張用「帝國憲政會」，或「帝國憲政黨」，故以後簡稱憲政黨⁽²⁴⁹⁾。

保皇會名稱雖改（最後定名爲帝國憲政會），但康有爲強調感戴德宗皇帝的意念仍與昔日無異。「其聖像之供奉，慶典之稱祝，及奉詔書、稱同志，一依舊會之例。」⁽²⁵⁰⁾光緒三十三年九月，梁啓超奉康命，在日本東京成立「政聞社」，刊行「政論」雜誌，鼓吹立憲，主張速開國會，並派員返國，聯絡政要，發展勢力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十月，德宗、慈禧太后相繼逝世，舊保皇會失却號召，加以革命風潮日盛，海外憲政黨不得不與國內立憲團體合流，使國內的立憲活動轉趨頻繁。

至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八月，革命黨在武昌舉事，康、梁適在日本，康不願見革命成功，遂高倡存清的言論，康的徐子徐勤特於同年九月二十四日（十一月十四日）致書力勸康氏說：

(246) 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，頁 25～26。梁啓超：新大陸遊記（新民叢報臨時增刊本），頁 183～184。

(247) 轉見張玉法：清季的立憲團體，頁 232。

(248) 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，頁 156。

(249) 同上，頁 47～48。

(250) 民報（臺北，黨史會影印，民五十八年），第十三號，時評，頁 8。

頃十八省已盡行獨立，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齊集組織新政府及民主憲法，滿人氣運已絕，若復抗輿論存皇族，必為全國之公敵矣。美洲則人心更主共和主義，乞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，而散會事⁽²⁵¹⁾。

同時由於國內革命運動的成功，海外的帝國憲政會有一部分順從時潮，響應共和，其餘則迭遭革命黨（尤其是同盟會）的破壞和羞辱，一蹶不振。宣統三年十二月二日（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日），美洲憲政會會員廖照、蔣奈、林鶴年、劉天錫、林任之等致書其總會長康有為說：

美洲吾黨除雲域島少數僅足支持，加東時有衝突，中央各小埠早不能支，而美國大埠會所扁額被其逼落，勒扯民族。砵崙限於二十四小時而扯旗落扁，我同志不服，尚在交涉中。市得頓限以四小時而落其扁額，不準有帝國字樣，同志太少，不能拒絕，卒被鼠黨所謂同盟會用野蠻手段而破碎之，且毀壞會所各俸照，而莫敢誰何，並毆傷同志五、六人。一月以來，各埠同志告警書，其抑鬱之情，誠不能卒讀耳⁽²⁵²⁾。

海外憲政會備受打擊，倉皇無奈的情狀，由此可以概見。其會員因此意氣消沉，零略星散，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五月，梁啟超謂「海外吾黨，今止餘百分之二、三。」⁽²⁵³⁾當係實情。

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即陰曆壬子年正月初二日），帝國憲政會通告改名為「國民黨」⁽²⁵⁴⁾，由徐勤、潘鴻鼎等人主持，擁護康有為、梁啟超為黨外領袖，伍廷芳、溫宗堯為黨內領袖⁽²⁵⁵⁾。國民黨成立後，康有為致書各埠同志說：

今既時運遷移，新舊代謝，合五大族而大一統，存帝號而行共和，實吾舊旨，仍得我心。……唯今國體已非君主立憲，今特復丙午前舊名，定吾黨為國民黨，旗用五色，合五大族，亦吾黨滿漢不分之始志也⁽²⁵⁶⁾。

同年五月，國民黨因勢力較小，發展困難，遂與「統一黨」、「民社」、「國民協進會」、「民國公會」合併，組成「共和黨」⁽²⁵⁷⁾。海外憲政會勢力，則受康有為影響，大體依舊，未捲入國內政潮⁽²⁵⁸⁾。

(251)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，頁366~367。

(252) 同上，頁375。

(253) 見「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麥孺博致先生書」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，頁385。

(254) 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，頁95。

(255) 李守孔：民初之國會（臺北，中國學術獎助會，民五十三年），頁37。

(256) 康有為：「壬子致各埠書」，萬木草堂遺稿（臺北，成文，民六十八年），頁322。

(257) 謝彬：民國政黨史（臺北，文星，民五十一年），頁45。

(258) 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，頁76。

(二) 民初康有為及其弟子的動向

武昌起義後，清廷解除黨禁，康有為始謀歸國。時革命軍決行共和，清室則主立憲，康遂撰「共和救國論」號召天下，倡虛君共和之說，認為中國實行帝制已歷數千年，不可驟變，而大清得國最正，歷朝德澤，淪洽人心，存帝制以統五族，弭亂息爭，莫順於此⁽²⁵⁹⁾。康迴護清廷的用意，昭然若揭。

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清帝下詔遜位，民國確立，虛君共和的主張卒不能行。彼時康正旅居日本神戶附近，態度十分消極，所撰詩文頗多懷念清朝的哀痛字句，例如：

我比古賢壽已永，幼訝衰翁今與參；絕域蘇卿人老矣，書空殷浩事何堪。婆娑槐樹傷身世，爛熳櫻花照壑巖；故國于今易朝市，惟將淒愴問江潭⁽²⁶⁰⁾。

孤臣孽子的心境，表露無遺。

康所以抱持這種態度，約有如下幾個原因：

其一、康個性固執主觀，加以年事已長（民國元年康已五十五歲），更不易變通妥協，順應時潮。

其二、康對清德宗始終存有感恩圖報的心理，雖然德宗已逝，康却愛屋及烏而竭力效忠清室。

其三、康一向主張君主立憲（民國以後康倡言虛君共和，在本質上仍與君主立憲近似），見共和政治確立，感憤之餘，益增他懷眷舊朝的程度。

其四、康與袁世凱及革命黨積怨已深，極難排解。故民國初肇，袁一連三函，邀康返國從政，均為康所推拒⁽²⁶¹⁾。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二月，康命其門人陳遜宜、麥鼎華等編印「不忍」雜誌，月出一冊⁽²⁶²⁾。康在序文中指出他刊行不忍雜誌的原因說：

親生民之多艱，吾不能忍也；哀國土之淪喪，吾不能忍也；嗟紀綱之亡絕，吾不能忍也；視政治之窳敗，吾不能忍也；傷教化之陵夷，吾不能忍也；觀政黨之爭亂，吾不能忍也；懼國命之分亡，吾不能忍也；願言極之，測測沈詳，余意也，此所以為不忍雜誌耶⁽²⁶³⁾！

(259) 張伯慎：《南海康先生傳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年），頁 51。

(260) 康有為：《南海康文集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），卷五，頁 40。

(261) 袁函及康的覆函，俱見徐有朋編：《袁大總統書牘彙編》（臺北，文星，民五十一年），頁 24～27。亦見康有為：《康南海書牘》（臺北，文海），卷上，頁 1～5。

(262) 康文佩（康同璧）編：《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），頁 94。

(263) 康有為：《不忍雜誌彙編》（臺北，華文，民五十七年），第一冊，書前序文。康在《不忍雜誌》上非議民國政治的文章甚多，後人對此也有系統的陳述，可參閱侯外廬：「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」，《中華論壇》，第二期（民三十四年二月），頁 24～26。

充分顯示康對民國的惡感和憂懼。

同年七月八日，康母勞連枝氏病逝於香港，時康正在東京割瘍，三個月還不痊癒。到十月，才奔喪回香港。十一月四日，康以海明輪運亡母及亡弟廣仁的靈柩到廣州，十六日葬母、弟於南海縣的銀塘鄉，葬畢回香港(264)。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六月，康至上海定居，與諸遺老會晤，相談甚歡。不過由於康早年提倡「新學」，曾招致衛道之士的嚴厲攻擊，像梁鼎芬即痛詆康、梁「名為講學，實與會匪無異。」(265) 雖時至民國，事過境遷，梁對康當不無芥蒂。胡思敬便曾致函友人，反對遺老與康交往：

近來，海上諸老，好與康聖聖人遊，即康亦自以清室遺老自命，僕頗不以爲然。前致書培老（按：即沈曾植，字子培）提倡宋學中云：光緒將亂之初，一、二小人之邪說，可以煽動四方；即暗指聖人及其徒梁啓超也。前塵已杳，後軫方長，謹寄舊刻履霜錄兩冊，好惡雖不必盡同，是非究難逃公論，願與前輩先生共參酌之(266)。

足見康與遺老復辟的心志固然相同，但是仍有少數固執的遺老，對康不能盡釋「前嫌」，取得協調。

此外，以康有爲及其弟子爲主幹的舊保皇會勢力（即憲政黨）領導階層內部，也有分裂的傾向。其中部分人士自革命軍興，便開始反對康氏的主張，認爲虛君共和之說「偏僻迂謬，不切時勢，萬無附從之理。」(267) 他們紛函梁啓超，促其「各樹一幟，各行其是，萬不可再屈以求合。」(268) 清廷退位後，他們又力勸梁氏迅即出山，勿失時機，略謂：

自武昌肇事以來，足下政見未經發表於世，有之則僅一新中國建設問題論，其時所持論仍是虛君共和制，若有機不出，則人將疑足下仍有故清繫念，他日若有宗社黨餘孽煽惑，且誣足下以惡名，雖有百喙，將何從而辨之(269)。

梁頗爲所動，遂逐漸放棄虛君立憲的想法，轉爲積極擁護共和。據丁文江稱，梁與康正式分手，是在民國元年四、五月間：

（元年）四、五月間，先生（指梁啓超），有請南海（康有爲）宣布退隱之議。此事南海似已同意，惟麥孺博（孟華）氏反對最力。此時各方面攻擊保皇派甚烈，

(264) 趙豐田：「康長素先生年譜」，*史學年報*，二卷一期，頁228。

(265) 蘇輿編：*翼教叢編*（臺北，合聯國風，民五十九年），卷六，頁2。

(266) 胡思敬：「致王病山書」，*退廬叢牘*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九年），卷四，頁31。

(267)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，頁370。

(268) 同上，頁371。

(269) 同上，頁373。

大概是爲緩和各派的攻擊，才有此議。可是先生和南海的分途，就從這時起始了(270)。

梁啓超態度的轉變，乃是基於個人的信仰，環境的需要，而加以考慮的。其一、他原本信仰民主共和，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以後轉而主張君憲，避免革命引致瓜分，則爲重要因素之一。然而革命既非一己之力可以阻止，不如順應大勢，或者還有實現自己主張的一日。其二、君主立憲已經窮途末路，無可作爲。其三、立憲派人士多數均已轉變擁護共和，佔有相當勢力，如不隨同轉變，這一部分可以引爲政友的勢力亦將失去。屆時進退失據，雖焦頭爛額，亦無可爲(271)。

因此，保皇會勢力遂分裂成兩派，一派以梁啓超爲首，熱衷於民權運動，紛紛歸國，爲民國的前途而奮鬥。另一派則仍舊追隨康有爲，忠心不貳，爲恢復清朝及虛君共和的主張而奔走，這一派人士多爲康氏「萬木草堂」弟子(272)。其中以徐勤、麥孟華、潘若海等最爲知名，態度也最積極。

徐勤（一八七三～一九四五）字君勉，號雪庵，廣東三水人，邑庠生，十八歲入萬木草堂，拜康爲師，以能辯能文著稱；歷任澳門知新報主筆，橫濱大同學校校長，香港商報、廣州國是報經理，是保皇會、憲政會的領導人之一，也是康有爲最忠實的信徒(273)。康在民國二年年初所撰「送三水徐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」一文中說：

君勉年方強仕，從吾游二十有四年，與吾共患難十有五年，與吾離索也五年，其待我至忠且敬也，美墨非澳環海之國民黨二百埠，定名于丙午（按：指光緒三十二年），因以丙午國民黨名，皆君勉總護之，其撫慰至周，其事至勞苦，日僕僕于南洋、美墨間十餘年，舍君勉無人能任之者(274)。

對徐勤推崇備至。民國成立後，徐表面上返國從事政黨活動，暗中却秉承康的指示，伺機贊助復辟。徐勤之子徐良，後亦爲復辟派分子，爲康效命，不遺餘力。

(270) 同上，頁384。

(271) 張朋園：《梁啓超與民國政治》（臺北，食貨，民六十七年），頁9。

(272) 廣州萬木草堂是康有爲政治運動的起點，創設於清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，由康主持，戊戌政變之後關閉，數年之間，至草堂受教者，當在千人以上。據蘇雲峯初步調查，草堂弟子姓名可考者五十一人，計爲梁啓超、陳千秋、徐勤、韓文舉、麥孟華、麥鼎華、麥仲華、伍憲子、歐渠甲、湯覺頓、張伯楨、梁啓田、潘若海、陳遜宜、梁炳光、梁朝杰、葉覺邁、韓銘基、曹泰、王覺任、譚錫鏞、林奎、龍澤厚、韓疊、梁應騞、陳國鏞、梁君可、錢定安、鄭壽銘、梁小山、劉楨麟、羅伯雅、葉衍華、陳繼猷、康同勳、梁伯鳴、潘藻鑑、鄧百村、陳汝成、陳和澤、龍伯純、張學環、羅普、羅惇齋、洪年、紀景福、刁宸英、林續統、陳介叔、鄧元翊、盧毅安。可參見蘇雲峯：「康有爲主持下的萬木草堂」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三期，下冊，頁442～444。

(273) 參閱康保延：「徐君勉傳」，廣東文獻，十卷二期，頁41。蔣貴麟：「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」，大陸雜誌，六十一卷三期，頁22。李雲光：康有爲家書考釋（香港，滙文閣，一九七九年），頁3。

(274) 不忍雜誌彙編，第一冊，卷五，頁6～7。

麥孟華（一八七四～一九一五）字孺博，號蛻庵，筆名曼殊、先憂子、傷心人等，廣東順德人，光緒癸巳年（一八九三）舉人；同年冬入萬木草堂，曾參與「公車上書」，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與梁啟超、汪康年等創不繼足會於上海，並為時務報撰文，主張「尊君權，抑民權」，戊戌政變後，助梁啟超在日本辦清議報⁽²⁷⁵⁾。在康門中麥與梁啟超齊名，人稱梁、麥⁽²⁷⁶⁾。麥病逝後，友輩將其作品與潘若海作品合刊為「粵二生詩詞集」行世⁽²⁷⁷⁾。

潘若海（一八七〇～一九一六）字之博，廣東南海人，亦為萬木草堂弟子，與麥孟華齊名⁽²⁷⁸⁾，合稱「二博」⁽²⁷⁹⁾。潘（號弱盦）「恢奇有壯志」，麥（號蛻盦）則「文章獨茂」⁽²⁸⁰⁾。民國成立後，潘、麥奔走活動，為復辟而努力。麥曾入馮國璋幕，潘則嘗入徐州猛將徐寶山幕，欲擁徐而「勤王」⁽²⁸¹⁾。其後又入長江巡閱使張勳，及江蘇將軍馮國璋幕，有所策畫。同時潘也與廣東遺老何藻翔、溫肅等人來往，奔走於江蘇、廣東、廣西等地，拉攏各地軍人，圖謀復辟。

五、舊官僚羣

（一）舊官僚羣的復辟傾向

這裏所謂的舊官僚羣，是指與共和政治妥協而繼續任職於民國政府的前清文武官員。他們多係傳統的領導階層，根據布來克 (C. E. Black) 的觀點，當傳統領導階層的權力轉移到新領導者手中的這一段時期，是整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最高危的一刻。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裏，這種「權力轉移」(Transfer of Power) 都將是其最大的政治鬥爭。鬥爭的結果總是現代化者獲勝，但是舊政權的領導者為保全他們的地位，必然竭盡所能，奮力掙扎⁽²⁸²⁾。這項觀點，與清末革命運動的過程和結果差相符合。祇是在民國取代清朝之際，有大批的傳統領導階層介入新政權中，使新舊領導階層間的權力轉移，在意義上甚為含混，在實質上也不够徹底，以致新政權虛有其表。

故就中國近代政治變遷的過程而言，革命黨人是屬於推動權力轉移的現代化者，誠

(275) 蔣貴麟：「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」，大陸雜誌，六十一卷三期，頁22。蘇雲峯：「康有為主持下的萬木草堂」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三期，下冊，頁442~445。

(276)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，頁447。

(277) 同上書頁，作「粵兩生集」。康有為則撰有「粵二生詩詞集序」，載萬木草堂遺稿，頁179~180。

(278) 「康南海弟子考略」，大陸雜誌，六十一卷三期，頁23。

(279) 李雲光：康有為家書考釋，頁14。

(280) 黃濬：花隨人聖盦摭憶（香港，龍門，一九六五年），頁299。

(281) 康有為：「粵二生詩詞集序」，萬木草堂遺稿，頁179。

(282) C. E. Black 原著，郭正昭譯：現代化的動力（臺北，環宇，民六十一年），頁68。

然他們係清末革命運動的播種者和耕耘者，却未必是唯一的收穫者。武昌起義不久，各省紛紛響應，先後宣布獨立。其中立憲派人士的主動參與，以及清朝官員自願或被迫採取的隨聲附和態度，都有決定性的影響。此外，由於革命陣營的自相傾軋，缺乏強勁的軍事力量，致使各省獨立期間，革命黨未能有效地控制全局，最後不得不借重當時掌握清廷軍政實權的袁世凱，誘以重利，以和平的方式來完成革命。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清廷遜政，南北統一，以袁世凱為首的一批舊官僚又完整無缺地納入共和新政權中。所以，在袁世凱治下的民國，無論中央或地方，均具有濃厚的官僚色彩。尤其是民國二年九月國民黨討袁失敗後，舊革命勢力全面崩解，舊立憲派則依附舊官僚派，政治現代化遂遭重大挫折，難以為繼。

舊官僚勢力的重新抬頭，對民初政治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。這批舊官僚泰半出身於舊社會，思想保守，觀念落伍，加以深受數千年帝制傳統的薰染，因此在心態上或多或少都有復辟的傾向。他們復辟傾向的強弱，往往視本身的利害及環境局勢的變遷而轉易。因此，在共和聲中，他們多半安於現狀，謹守其既得利益，以求明哲保身，甚至追求更高的權位，復辟的傾向遂較為隱晦微弱。可是，一旦復辟時機到臨，他們立即隨勢響應，參與行動，這多少含有左右逢源、投機取巧的意味在內。這類舊官僚，可以張勳、馮國璋、徐世昌等人為代表。

(二) 代表人物舉要

1. 張勳（一八五四～一九二三）

張勳字少軒（亦作紹軒），江西奉新人⁽²⁸³⁾。清末中法戰爭期間在廣西投軍，其後迭經兩廣總督張之洞、廣西巡撫潘鼎新、李秉衡、廣西提督蘇元春奏保，累官至參將加副將銜。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因四川提督宋慶邀贊毅軍軍務，張勳遂於同年八月抵奉天，挈馬隊為前鋒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十月，袁世凱在小站（天津附近）編練「新建陸軍」，張以副將銜為頭等先鋒官，旋任工兵營、備補營管帶兼行營中軍事。袁世凱任直隸總督，張以四川建昌鎮總兵（光緒二十八年十月授）統率淮軍，並剿辦口北馬賊。日俄戰爭結束後（光緒三十二年），張以奉軍遼北總統兼統後路右路馬步各營駐防昌圖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四月，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，以張為行營翼長節制三省防軍。翌年，授雲南提督，轉甘肅提督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十月，詔令總統江防各軍會辦長江防守事宜，駐浦口專摺奏事。翌年七月，調補江南提督；八月，武昌革命軍起事，由於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官員棄南京而遁，張遂能出任江蘇巡撫，繼而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⁽²⁸⁴⁾。

(283) 陳三立：「張忠武公墓志銘」，碑傳集補，卷末，頁15。

(284) 參閱張勳：松壽老人自敘（日本，東洋文庫藏），頁1~4。

但不久，張即被革命黨的江浙聯軍擊敗，退往江北，暫居徐州。接着清廷遜政，民國確立，張的榮華富貴橫遭驅散。因此，他痛恨民國，痛恨締造民國的革命黨人。翌年（民國元年）春天，張統率所部約三、四千人移駐山東南部的兗州。同年四月，袁世凱改授他為鑲紅旗漢軍都統，他表面上接受民國任命，暗中却渴望復辟。民國以後，他和他的軍隊都仍然留着辮子，居心至為明顯。駐兗州時他經常與遜清遺老、宗社黨人通款，曾密議於民國二年春夏間舉兵復辟，因事洩而未發，其中詳情，已在前面述及。民國二年七月，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，袁世凱便利用他仇視革命黨人的心理，命他率部進攻南京。他攻下南京後，袁酬以江蘇都督的職務（二年九月三日明令發表）。不過袁並不視他為心腹，隨即借外交問題調他為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（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表），而以馮國璋繼任江蘇都督⁽²⁸⁵⁾。他大為不滿，此後即以長江巡閱使名義，駐兵徐州，伺機而動。

張勳駐屯徐州，前後共計三年（民國三年至六年），所部「定武軍」⁽²⁸⁶⁾，號稱六十營；既非新軍編制，復非湘、淮軍老營制；每營補足不過三百六十名，兵員總額祇有二萬二千。惟武器則甚充足，二次革命期間，張勳攻下南京，舉凡徐寶山部遺槍械，以及金陵製造局、江陰、鎮江所存槍炮，無不悉數沒收，其後並將其捆載携往徐州。袁世凱稱帝前後，張又由德國某洋行及上海某洋行購辦大批軍火，致「定武軍」擁有大炮二百餘尊，機槍四百餘挺，子彈糧服，不計其數⁽²⁸⁷⁾。這是張圖謀復辟而深為人矚目的主要原因。

2. 馮國璋（一八五九～一九一九）

馮國璋字華甫（亦作華符），直隸河間人，天津武備學堂步科畢業。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，馮是「新建陸軍」的督操營務處。其後歷任直隸軍政司訓練處總辦、（中央）練兵處軍學司正使、陸軍部軍諮處正使、副都統銜陸軍貴胄學堂總辦等職。辛亥武昌革命軍興，馮任清軍第一軍總統，兩敗革命軍於漢口、漢陽，旋調返北京，改任禁衛軍總統。當袁世凱暗中斡旋迫使清帝遜位之際，馮甚表不滿，為清廷力爭再三，據深悉北洋內幕的張一麐記稱：

和平談判漸已就緒，段公（段祺瑞）率諸將要求退位，公（馮國璋）以無位則帝號不存，位為虛，政為實，政可讓，位不可去，力爭累日，故禪讓詔書不言退位，而言遜政。然朝旨雖已允行，而滿蒙人心，不能帖伏，訛言朋興，其主力實在禁軍，禁軍皆八旗子弟，其人率忠勇強力，訓練三年，頗成勁旅。遜政之詔遲久而不敢發，將待公之安撫而疏通也。……（馮）爭優待皇室條件，爭待遇滿蒙

(285) 陶菊隱：《督軍團傳》（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年），頁9。

(286) 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，張勳被任命為定武上將軍仍兼長江巡閱使，張勳所部因名「定武軍」。

(287) 文藝編譯社編：《復辟始末記》（上海，民六年），頁9。

同條件，雖不能盡如所求，而裨益於清室者至鉅。至此乃宣布遜政，而公之心苦矣(288)。

至民國元年二月二十日，馮又在賀袁世凱膺選民國大總統函中說：「願公愛國救民，早膺斯席，保衛皇室，統一中原，大軍幸甚，本軍幸甚。」(289)足見馮對於清廷的迴護和忠悃。

民國二年春，馮適在直隸都督任內，青島遺老于式枚、劉廷琛等密議復辟，馮和張勳皆預聞其事(290)。當時議定由張勳出兵進攻濟南，張曾派遣老溫肅、胡嗣瑗勸說馮國璋，據溫肅記稱：

(癸丑，即民國二年)四月，訪馮國璋。因胡琴初(胡嗣瑗)介見直隸都督馮國璋，致恭邸(恭親王溥偉)意，告以兗州密謀，馮允為贊助，馮、張(張勳)聯權自此始(291)。

但馮終懼于袁世凱勢力，不敢有所行動。其時張勳也派人拉攏兗州鎮守使田中玉，田表面敷衍，却暗中告密，袁據報，即令遮斷兗州、濟南間鐵路，而張勳所部亦未能離兗北上。另外何藻翔在「六十自述」中記稱：

余壬子(民國二年)正月返粵，即移書胡某，揭袁(世凱)陰謀，勸先發制人，及其未定而擊之，效羅昭諫請吳越王討梁，雖非其人，急何能擇。潛與溫毅夫、胡琴初、麥孺博、潘若海、顧君用等謀，游說諸將，以伐其謀。語毅夫曰：「今當犧牲清室優待條約，以救五族，趁籌安會議，贊成君主政體，迎立故主，廢臨時約法，復資政十九條，通電舊將，徵求同意。」毅夫聽之。至滬，與善化瞿相鴻禔等集議，改通電用專函，三十三人聯銜推馮(國璋)、張(勳)為盟主，願念舊恩，主持大局，公推劉祭酒幼雲主筆，蓋出鄙議也(292)。

以上都是馮參與復辟密謀的有力證據。民國二年十二月馮調任江蘇都督以後，便擁重兵，開府南京，為當時軍界的泰斗。並聘用遺老胡嗣瑗為秘書長，潘若海、麥孟華等為幕僚，暗中與復辟派人士通款，足以反映馮在復辟運動中的重要地位。

3. 徐世昌(一八五五～一九三九)

徐世昌字菊人，號東海，直隸天津人，早年在河南懷寧縣署充當書吏，與袁世凱結識，成為莫逆之交。光緒十一年(一八八五)中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；光緒二十一

(288) 張一麐：「故代理大總統馮公事狀」，心太平室集(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五年)，卷四，頁17。

(289) 「禁衛軍馮爵統國璋率同全軍慶賀袁大總統函」，載臨時政府公報(中央黨史會影印)，民元年二月二十日，公函類。

(290) 章炳麟：太炎先生自訂年譜(香港，龍門，一九六五年)，頁23。

(291) 溫肅：溫文節公年譜，頁5。

(292) 吳天任：何嗣高(藻翔)先生年譜(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一年)，頁139。

年（一八九五），袁世凱奉命在小站編練新軍，以徐爲營務處總辦。其後歷任練兵處提調、署兵部左侍郎、巡警部尚書、民政部尚書、東三省總督、郵傳部尚書、大學士、軍機大臣、內閣協理大臣、太傅等職。位高權重，堪稱清廷元老。清帝退位後，徐即離京遷居青島，不問世事。當時的徐，心境殊爲尷尬。一則他以「疏逖小臣」，數年間即「躋身宰輔」，待遇特厚；所以他對清朝感念至深，始終難以忘懷。民國成立後，他隱居青島，無疑是這種心理促使所致。一則清廷的遜政，袁世凱實爲關鍵人物。徐與袁爲總角之交，關係密切，非同泛泛，在感情上實難峻拒袁的延攬。但他礙於清朝初亡，不便遽仕民國，故暫居海濱，但允於兩年後再行出山助袁⁽²⁹³⁾。

民國三年五月一日，新約法公布，廢國務院官制，設政事堂於總統府，於是袁世凱起用徐爲國務卿，徐欣然樂就。自民國三年五月一日就職，至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卸任，在職凡一年半。所引用的閣員，如外交總長孫寶琦、內務總長朱啓鈐、陸軍總長段祺瑞、海軍總長劉冠雄、財政總長周學熙、農商總長周自齊、交通總長梁敦彥，泰半爲舊官僚⁽²⁹⁴⁾。

至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凱因西南諸省舉兵反對，下令撤銷帝制，恢復民國，重任徐爲國務卿，以緩和人心。但各省不肯罷兵，紛電促袁退位。徐遂密與張勳、倪嗣沖電商實行復辟，謂「民黨相迫如此，不如以大政歸還清室，項城（袁世凱）雖退位，仍得居總理大臣之職，領握政權。」議定後，即由梁士詒、張鎮芳等向清室再三商懇，卒被拒絕。民國五年六月，袁世凱病歿，其柩輿回河南彰德時，北洋軍人首領咸往致祭，又曾秘密會議，由徐主席，提議復辟，在場諸人，一致簽名贊成⁽²⁹⁵⁾。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北京國務院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，謂「大總統深欲表其實心友好之誠，擬贈予日本大皇帝大勳章一座，派前交通總長曹汝霖充當專使，赴日呈遞，希即面見日本外交當局接洽。」章即往訪日本外相本野，陳述詳情；翌日，本野答覆，謂已奏明日皇，日皇頗願接受⁽²⁹⁶⁾。據說專使曹汝霖在行前曾秘密走訪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，且透露此次「贈勳」內幕，實暗中奉有徐世昌、張勳指示，私下探聽日本當局對復辟的意見⁽²⁹⁷⁾。惟其後曹因故未能成行。民國六年二月，陸宗輿赴日收領交通銀行借款，同時携有徐世昌所擬的復辟條件，以試探日本政府態度。徐所擬條件大要如下：（一）擁戴宣統復辟；（二）設輔政王一員，代皇帝執掌大權，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的漢人充任；（三）輔政王由皇帝勅任，十年一任，但得連任；（四）皇后由漢大臣之女聘充。陸宗輿赴

(293) 參閱警民：徐世昌（臺北，文海，民五十六年），頁24~26。

(294) 競智圖書館輯：徐世昌全傳（北洋人物史料三種之一，臺北，文海，民六十年），頁3。

(295) 孫毓筠：「復辟陰謀紀實」，中華新報（臺北，中央黨史會影印），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，第一張第三版。

(296) 張忠絃：中華民國外交史（臺北，正中，民四十三年），頁191。

(297) 林權助著，鄒念譯：「林權助筆下的張勳復辟」，近代史資料，總三十五號，頁112~113。

日後曾與日本當局接觸，竟不得要領而返(298)。

由上所述，徐世昌確為復辟派，已無庸置疑。然徐秉性沉穩，喜怒不形於色，為人八面玲瓏，老於世故，而又熱中名利，誠屬最典型的舊官僚。在袁世凱當政時期，徐格於與袁交深誼厚，一意助袁，復辟的心念深自隱藏。袁死後，徐再無顧忌，全力贊助復辟。但因個性使然，絕不魯莽行事，當日熟知復辟內幕的孫毓筠曾指出說：

主張復辟最力者，本為徐世昌、張勳、倪嗣沖等，而徐與張相差之點，即一在必經過種種手續，由曲線以達其目的，一在簡截了當，以趣其目的(299)。

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評論。

六、結 論

復辟派一向缺乏統合而嚴密的組織，它祇是對於一羣抱持恢復清朝迎立遜帝此一共同意念，而有實際言行者的籠統稱謂，殊難與具有近代特質的政黨、學會等團體相提並論。復辟派不僅組織鬆散，組成分子的背景和從事復辟的動機，也不盡相同。以滿人為中心的宗社黨，徒祇標榜狹隘的種族主義，採取激烈的報復手段，來進行復辟，自然是不易獲得漢人復辟勢力的鼎力支持。甚至為了製造暴亂，宗社黨不惜去勾煽一些愚昧無知的盜賊、會匪和莠民，逐漸流為打家劫舍式的地方滋擾行動，對整個大局，影響殊微。

漢人復辟勢力則以遜清遺老、舊保皇會分子，及舊官僚羣為主體，大致上是一個士人集團，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和從政經驗，對時局的發展演變極為注意，以便伺機行事。同時他們也經常透過文字，發為宏論，以煽惑人心。因此，他們的復辟活動，遠較宗社黨人有成效。不過，在民國初年，由於共和甫立，民心厭亂，他們的活動，很難激起波瀾，何況他們以匡復清室作號召，也不易引起多數漢人的共鳴。此外，復辟活動並未涉及社會各階層（如農、工、商）的利益，復辟派自然是得不到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贊助。所以，一般人所謂的「復辟運動」，不是一個全民性的運動，甚至稱不上是一種運動，因為它缺乏强有力的羣衆基礎和統一的領導。復辟派唯一能行而有成功希望的途徑，便是厚結手握兵柄的軍政大員，利用民國政府內部的衝突矛盾，以迅捷的政變方式，來獲致一時的微倖。

總之，復辟活動祇是單一階層中少數人奔走進行的活動，它不像清末的革命運動，能得到全民性的迴響。加以，復辟的本質在於恢復舊制，是消極而退化的；革命的本質則在於開創新局，是積極而進取的，在氣勢方面，復辟派遠遜於革命派，民國初年復辟

(298) 同註(295)。

(299) 同註(295)。

活動迭遭挫敗，未能有成，也早已不足為奇。不過，復辟派始終鍥而不捨，民四、民五捲入討袁護國的漩渦，實則是別有懷抱，想乘亂復辟。民國六年，張勳終能把握「府院之爭」的機會，演出一幕曇花一現的「復辟事件」，使民國命脈中斷十餘日。直至民國十三年冬馮玉祥於「首都革命」後，強迫遜帝溥儀遷出皇宮，復辟派才遭到致命的打擊，意氣日漸消沉。民國十七年又發生所謂「東陵盜案」，更加深了溥儀及復辟派對民國痛恨的程度，終至輕易為夙有侵華野心的日本所誑誘。「九一八事變」以後，日本在東北成立「滿洲國」，即扶迎溥儀為執政，繼而稱帝。雖然「滿洲國」的出現，溥儀的登基，多少令復辟派萌生幾絲片面的慰藉，可是，就復辟派二十餘年來所努力追求的復辟目標來說，不僅沒有達成，反而弄得不倫不類，全然變質了。